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論

ERSHI SHIJI ERSHISI SHI
YANJIU ZONGLUN

第一卷

分卷主编◎瞿林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 第一卷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論

ERSHI SHIJI ERSHISI SHI YANJIU ZONGLUN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瞿林东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瞿林东主编）

ISBN 978-7-5000-8010-7

Ⅰ．2… Ⅱ．瞿… Ⅲ．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 ②二十四史—研究 Ⅳ．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7359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前期统筹 劳雅路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电　　话 010-88390671
网　　址 http://www.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00千字
印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010-7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极方面的历史影响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它是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明的光辉记录。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5年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①。史书重在"事实",正史既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81年曾对二十四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②这可以看作是对二十四史的全面的评价。

四

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精心的整理,也可以说是研究中有整理、整理中也有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其所得者专著以百数,论文则以千计。

以研究而言,至少包含考证和评论两种类型。前者如范文澜的《正史考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等,都是名著;后者如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季镇淮的《司马迁》、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安作璋的《班固与〈汉书〉》等,亦皆佳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

---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开明书店1936年版。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像梁玉绳作《〈汉书·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憾惜"，编者搜求丛书和稿本，荟萃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定名为《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七十多年来，此书对历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序文中说："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如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讵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②]以十余年的工夫，"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就是为了"备读史者之参证"，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什么动力？这除了说明二十四史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说明校史者对二十四史极其敬重和热爱，恐怕没有别的原因了。作为读者，要真正体会到校史者的这种甘苦和心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

---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载《二十五史补编》第 1 册书首，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②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 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人所谓十七史的基础上，又增加元修宋、辽、金三史和明修《元史》。明朝南北国子监先后在嘉靖初和万历中，分别刊刻二十一史，世称"监本二十一史"。于是，"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条）。清乾隆四年（1739），《明史》修成，合为二十二史。考史学家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所考含《旧唐书》而不含《明史》，跟上面说的二十二史不同。另一考史学家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所论包含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全书实际上涉及二十四史。

关于二十四史。宋人重十七史，后金章宗也明令"削去薛居正《五代史》，只用欧阳修所撰"（《金史·章宗纪四》）。自元代以后，《旧五代史》逐渐不行于世。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原文，排比编纂，大致恢复本书原貌。《四库全书》修成，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增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是为"钦定二十四史"，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缮写的文津阁本和武英殿刊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二十四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正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突出代表。①

三　二十四史的性质

二十四史是什么样的书？这是认识二十四史的一个关键问题。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旨在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二十四史作了这样的判断：

① 以上均见瞿林东《二十六史大辞典·导论》，戴逸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第2—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白寿彝认为，纪传体实质上是一种综合体，他对纪传体的形成、特点和在历史撰述上的意义与价值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

纪传体的创始人司马迁说：他的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就是说《史记》里有大量的记事、记言和别的成分。《汉书·司马迁传》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记言和记事的综合。相传远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一定可信。但记言和记事确是两种最古老的体裁。……《史记》里最大量的篇幅都是把记事、记言综合在一起。记事和记言相结合，如果以人物为中心，就成为人物的传记。纪传体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载记、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本纪，基本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载记是割据政权的历史。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来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史论，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议论。更具体地说，列传里有人物的专传，有合传，有杂传。书志里包括有经济史，如《史记》的《平准书》、《汉书》

的《食货志》;有地理书,如《汉书》的《地理志》、《沟洫志》、《后汉书》的《郡国志》;有法制史,如《汉书》的《刑法志》和后来各史的《职官志》;有学术史,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

清初,马骕著《绎史》160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的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马骕的书,在体裁上虽然采用了很丰富的形式,反映了他的才能,但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不精,我们还是可以对它提出更高要求的。①

白寿彝的这些论述,从史学理论上和历史撰述实践上,从纪

① 白寿彝:《史书的编著——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见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第78—8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史事实之所荟萃”。唯其如此,治中国史者不能不重视历代正史。顾颉刚作为“古史辨”学派的倡导人物,他的这番话格外显得分量之重。有的研究者形象地比喻说:“二十五史为研究中国史取材之大本营。”①这是用最简洁的语言道出了历代正史之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树平认为,二十四史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

> 二十四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长达四千多年,包括了我国历史上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时期,它记事久远,前后衔接,自成体系,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在明朝灭亡以前几千年间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和活动,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
> 司马迁在发凡起例时,就决定《史记》要包罗天上地下,贯古通今,融合百家。以后的各史,虽然与《史记》有通史与断代史的差别,没有沟通古今,但集当代“天下行事”于一书的意图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二十四史如同万象兼备的百科全书,其篇帙之宏伟,史料之丰富,是其他史书望尘莫及的。它向读者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卷,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由于我国古籍多有散失,二十四史就显得更为珍贵,成为研究中国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

作者还从阶级斗争史、经济发展史、法律制度史、科学技术史、社会风俗史、中外关系史等几个方面,指出了二十四史的史料价值。

---

① 张立志:《正史概论·导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作者进而认为:“各史的本纪部分,逐年记载历代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把它们依次连贯起来,就是一部初具规模的编年体大事记。各史的人物列传也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某些历史真相,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必要资料。”①

王海晨著文,从历代正史的“内容实质”出发,以宏观的视野看待“正史”的“基本价值”,这就是:其一,“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历史记录”;其二,“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历史知识宝库”;其三,“是一部记述‘人’造历史的世界史学名著”;其四,“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阶级间的矛盾和对立”;其五,“所搜史料十分珍贵、系统,更显价值巨大”;其六,“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②。

还有作者从历史、史家、史学的相互关系中,阐述了二十四史的历史价值。瞿林东认为:“诚然,在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之间,还有史学家的作用,这主要是他们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在反映历史面貌、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局限,史家(包括史官)的认识能力和历史观点不能不带着时代的特点和印记;由于社会环境(如政治环境、学术环境等)的影响,也会在史家的历史撰述上产生这样那样的反映;由于史家个人的综合素养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的历史撰述也必然存在着种种差别。这是中国史学上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史学发展若干规律的现象,二十四史及其作者固不能例外,就是产生于近代的《新元史》、《清史稿》和它们的作者也是如此。对此,都可以用

① 吴树平:《二十四史简介》,第54—5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王海晨:《从二十六史看传统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

> 《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如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讹》，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如梁玉绳作《〈汉书·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
>
> 这三类书籍大多分散在各种丛书里头，很少单行本。谁要阅读，只有去搜求丛书；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力和时间，这个愿望就难以达到。还有一部分还只是稿本，并没有刻过；那就即使有了充裕的财力和时间，也很不容易有遇见的机会。我们常常这么想：如果把这三类书籍，分散在丛书里头的以及还只是稿本的，汇集在一起，加到全史里去，在读史的人实在是极大的便利。我们的能力虽然薄弱，我们应该对文化界尽这个责任。
>
> 我们抱着这个志愿，随时搜求丛书和稿本。到现在，关于补订各史表志的书籍，古人作的和近人作的，差不多齐备了。我们就把这些书籍汇印在一起，叫做《二十五史补编》，让它跟我们印行的二十五史相辅而行。①

《二十五史补编》所收各类有关历代正史的补作、校正、考订之书，多达二百余种，其中关于《史记》部分 8 种，《汉书》部分 28 种，《后汉书》部分 27 种，《三国志》部分 20 种，《晋书》部分 45 种，《宋书》部分 9 种，《南齐书》部分 4 种，《梁书》部分 3 种，《陈书》部分 3 种，《魏书》部分 12 种，《北齐书》部分 3 种，《周书》部分 3 种，《隋书》部分 7 种，《南北史》部分 7 种，两《唐书》部分 14 种，《五代史》部分 16 种，《宋史》部分 7 种，《辽史》部分 9 种，《金史》部

---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书首，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分6种,《元史》部分5种,《明史》部分6种,凡242种。尽管这些书大多出于清代学者之手,但诚如编者所说,把它们汇集起来,确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其嘉惠学林之功,实不可限量。

顾颉刚这样评论《二十五史补编》的价值:

> 治中国史学者之不能丢弃历代正史既如此,而正史中之表志,于典章之沿革、人事之变迁,各尽其贯穿综合之任务,使读之者对于历史现象有整个之认识,则更为此资源中之真精实髓。……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阙,则读史者目之所触,惟有林林总总之故事浮动于前,无由得其纲领,而前后相循之人事亦为之断而不续矣!
>
> 正史中不皆有表志,二十五史中表志齐备者,惟《史记》(称"书"不称"志")、《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九种;其有志而无表者,则有《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称"考"不称"志")等九种。自余《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等七种,则并表志而无之。此无表无志之七种与有志无表之九种,其不能称为完善自不待论;即就其有表有志者观之,作者之学术与其所取之材料俱未尝无瑕可指。故若曰"二十五史多缺憾",此固平心之论,非吾辈之有意轻侮古人也。

对于这一"缺憾",作者埋于心中多年。故作者为《二十五史补编》作序时,那种喜悦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写道:

工作的主次问题。很坦率地说,我们重视校勘,对标点分段,认为附带解决一下就行了。实践经验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校勘固然重要,但标点比校勘更具体、更重要。不负责任的古籍整理者,校勘遇到困难还可以回避,而标点遇到困难却是无法回避。它要求我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稍稍疏忽大意就会出漏子,失去科学性。"唐长孺、陈仲安进而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公众的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目的和要求,他们的见解是:"二十四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照原样重印行不行呢?我们认为,那样做很不便于读者。古书既无标点,又无断句。由于句读不明而引起的误解屡见不鲜。特别是到了近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变化很大,现在的青年阅读二十四史,实在是困难重重。即使中年以上有过阅读古汉语训练的人,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读懂。各史流传的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漏,给阅读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花一番功夫整理二十四史是必要的。标点便是这种功夫之一。我们按文义划分段落,区分句读,让读者易于理解。在人名、地名、书名旁加上标线,使读者易于识别。把一连串的官称、爵号、器物名称用顿号隔开,以利读者区分。把书中引用的古书、成语、文章、讲话加上引号,使读者明了。这样就使读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时间。"这一段话,极其中肯地道出了点校本的科学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宗旨。事实表明,点校本二十四史对于推动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普及,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严谨治学,严肃地对待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是这些史学家的共同特点。可以说,每一部正史的点校,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参与点校《元史》的亦邻真、周清澍道出了其中艰难:"在较为充实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全书撰写了2600多条校勘记,这是全体整理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元史》有它的特

殊性，史文除汉语外，还涉及到古蒙古语、古藏语、突厥语、梵语、波斯语、阿剌伯语等，因此，发现史文的讹脱，断定字句的是非，遇到许多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寻师访友，帮助我们释滞解疑。为了提高校勘质量，我们对史文中的纪日干支通篇进行了核对，由专人对历法数据做了验算。严敦杰先生帮助我们对天象记载中的一些讹文进行了校订，把现代天文学引进校勘记，提高了校勘的科学性。”当然，对于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实事求是的作法就是存疑。赵善诒、蔡尚思说出了他们对这种问题的态度和作法：“为了消灭破句，我们把难懂的词句、典故摘成卡片，查清源流，弄懂原意，仅《新唐书》一史就写了几千张卡片，以备参考。个别未弄清楚的问题，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留待以后解决。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党项传》中有一连串族名，屡经查核，也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存疑，未加标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这一工程的艰难和宏伟，通过这些学者的感受，专业工作者和广大公众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关于这一工程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价值，顾颉刚做了这样的概括：“二十四史点校本经过整理者和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已经全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文化出版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这部史书是在两千年里陆陆续续写出来的。如此完整连续的历史资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其中不但记载了我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而且还记述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历史。因此它是一部具有广泛资料价值的历史文库。”①

目前，中华书局正在对点校本二十四史进行修订，我们相信，一部更加完善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世。

---

① 以上所引均见1998年6月1日《光明日报》。

目　录

前言 …………………………………………………… 瞿林东（1）

《正史考略》绪言 ………………………………………… 范文澜（1）
"正史"简述 ……………………………………………… 来新夏（6）
"正史概论"导言 ………………………………………… 张立志（19）
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 …………………………………… 张元济（21）
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 …………………………………… 张元济（24）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 ………………………… 顾廷龙（26）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缘起 ………………… 王绍曾（29）
张元济和百衲本二十四史 ……………………………… 张人凤（37）
二十四史提要（节选）………………………………… 王健群（50）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感想和体会 ……………………………（67）
归功毛主席　归功周总理 ……………………………… 顾颉刚（67）
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 翁独健　赵守俨（69）
点校本为读者提供方便 …………………… 唐长孺　陈仲安（71）
标点比校勘更重要 ………………………… 王仲荦　卢振华（73）
校勘是做好标点的基础 …………………… 亦邻真　周清澍（75）
既要吸取前人成果也要创新 ……………… 孙毓棠　杨伯峻（76）

进行科学考证　提高校勘质量
……………………………… 郑天挺　王毓铨　周振甫(77)
坚决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斗争…… 裴汝诚　马伯煌(79)
应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工作
……………………………… 阴法鲁　陈　述　张政烺(81)
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 赵善诒　蔡尚思(82)
谈谈二十四史的整理 …………………… 中华书局二编室(83)
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 …………………………………… 吴树平(94)
二十四史各史体例的特点 ……………………………… 穆德全(103)
档案与二十四史 ………………………………………… 倪道善(119)
《二十五史论纲》自序 …………………………………… 徐　浩(125)
徐浩《二十五史论纲》序 ………………………………… 方觉慧(127)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 …………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129)
《二十五史补编》序 ……………………………………… 顾颉刚(132)
《二十六史大辞典》导论 ………………………………… 瞿林东(137)
漫话正史“表”与“志” ………………………………… 王锦贵(234)
论二十四史天文历法两志的整理 ……………………… 苏晋仁(239)
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 ………………………………… 邹逸麟(254)
正史艺文志概述 ………………………………………… 鲁　海(272)
正史艺文志补注考略 …………………………………… 韩继章(281)
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
——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 …… 陆人骥(292)
对二十五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中科技书目的
统计与分析 …………………………………………… 查永平(304)
二十六史中的青海史料介评 …………………………… 米海平(315)
二十四史中的南亚史料简介 …………………………… 耿引曾(326)

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 ………………………………… 许永璋(344)
学习毛泽东的读史精神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与二十四史研讨会”纪要 ……… 张岱年等(363)

主要论著索引 ………………………………………………… (376)

后记 ……………………………………………………… 瞿林东(381)

《正史考略》绪言

范文澜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江氏以中为簿书，足正许君之误。吴氏大澂谓："史象手执简形，古文中作𠁩……无作中者。"其说亦是。王氏国维非之，以为"中者盛筭之器，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一，象杖形者同意"。王说详《观堂集林》释史篇，兹不繁引。文澜愚蒙，窃意中即册之省形，中又中之变体。卜辞册字有作𦥓者，有作𦥑者，两手奉之，示册书繁重之义；史则仅从一又，示执简侍君，记言记动之义，盖册与中二形以繁省见义，非别有一物象中也。

史官之起，或曰仓颉，敻古茫昧，莫得而详焉。夏殷史官则有太史终古，内史向挚，皆丁季末虐乱之世，抱其图法，归身有道，彼岂轻背宗国哉，王官世守，守之以死，高文典策，诚不忍坐视沦亡而无所托也。洎夫姬周，载籍颇存，读《周礼》而知史职之备，翻经传而知史官之众。六经皆史，固无论矣；战国百家腾跃，各引一端。驰说诸侯，如蛙黾之噪潦岁，洵足以眩耳目而迷源流，然迹其

“观其释经，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史通·六家》）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汉书·艺文志》说，《礼记》玉藻作“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不同。）若《左传》者，虽以记事为本，而记言亦至繁夥，典谟诰誓，后世无作，则《尚书》、《春秋》二家，固已让《左传》家独步于史学界矣。又左氏纪一人书一事散见先后传中，始末周备，稍为条辑，即成列传，太史公作《史记》，春秋时事取《左传》者泰半，谓《史记》之一部，蜕化于《左传》，或无不可。

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太祖，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工也。（此节取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语，惟补入左传二字凡两处）

自迁书一变而有班固之断代史，刘知幾极尊此体，以为“《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郑樵著《通志》痛诋班氏，比之于猪，谓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

论》、《陆机传论》和《王羲之传论》的历史人物评论工作，于是《晋书》便居于八家晋书之首，地位显然高于它籍，开后世于多本中选取一种作一朝史书代表的风气，使"正史"代表正统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但是，刘知幾的《史通》中仍以"正史"与"杂述"并举。他所谓的"正史"是指能记录一朝大典的史籍，而以正杂对称，足见"正史"地位还不是非常尊崇的。

《宋志》沿《隋志》旧例，列"正史类"于史部之首，并由政府陆续雕版，刊印了正史 17 种。

《明志》的"正史类"包括纪传和编年二体，打破了历来以纪传体为"正史"的惯例。同时也证明清初修明史时，"正史类"尚能随意变易其内涵。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定 24 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正史"的神圣地位。它在"正史类"的小序中说：

> 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从此，"正史"之名始具特定含义。它既有代表正统政权的意味，又有国定的含义。

"正史"历来受到重视，其原因是：

一、"正史"记录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主要朝代。这些朝代大多是封建正统之所在，相沿具有高于其他史籍的地位。

明。这样既保留了原文,又指明了正字,符合校勘原则。对于人、地、书名都有标号。凡长篇文字,低格另起以醒眉目。注文用小字,易于观览。其体制可称完备。

③各史均有前言及校勘记,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因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目前最适用的一种较好印本。

四 正史的注、补、表、谱、考证

注、补、表、谱、考证是一类帮助阅读正史的史籍。其体始于南北朝,兴于唐、宋而大盛于清,但未立专类而附于正史类后。《隋志》小序中说:

> 《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四库提要》正史类小序也说:

> 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缪》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

据此,则注、补、表、谱、考证之体起源甚早,而“以备正史”、

"用资考证"正说明这类史籍对正史的辅助作用,所以《书目答问》特为之立一小类,附于正史类后,并注称:"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现分述讲体如次:

1. 注:即传注。传就是通过对原作(经)的解释以求传示后世,所以有经传之说。《左传》、《诗毛氏传》都有此意。注为注入己意,或称著,即说明之意。传注本无区别,大抵汉以前多称传,汉以下多称注。《史记》的《索隐》、《正义》和《集解》被后世统称为三家注。《汉书》从东汉应劭、服虔的《音义》后,陆续有注家。唐颜师古总集南北朝时期二十余家注成汉书注,有功于《汉书》,而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则又为集唐以来六十余家注而成。《后汉书》始有梁刘昭注及唐李贤传注,清末王先谦复有《后汉书集解》之作,甚便读者。至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尤著盛名,与《水经注》、《世说新语注》并称名注。裴注在陈志后130余年,史料比较集中,又经一定淘汰,条件较优。它的注法是条其异同,正其谬误,疏其详略,补其缺漏,引魏晋人著作达一百五十余种,今多佚,故裴注颇为后世所重。近人吴士鉴作《晋书斠注》是《晋书》的注本。

注本还有音义(如萧该的《汉书音义》,有辑本)、汇注(如《史记汇注考证》)、笺释(如李笠的《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校注(如王绍兰的《汉书地理志校注》)、合注(如王先谦的《新旧唐书合注》)、笺注(如王忠的《唐书南诏传笺注》、补注(如王先谦的《汉书补注》)、集解(如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等不同的名称和体裁。

2. 补:就是四库提要所说的掇拾遗阙。宋有钱文子的《补汉兵志》5卷。清代补缺之学甚盛。如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的《补宋书刑法志》等皆是。这

记必须整理出版,一九九〇年中华书局始行归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金史》等十五种,一九九二年继续从仓库中清理出《宋史》一种(缺一册)。其余《晋书》、《周书》、《北齐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等七种(《明史》原无校勘记)则已无从踪迹矣。先生二十年辛勤校史之成果,三分之一付诸东流,可胜浩叹。犹忆先生当年追寻薛居正《旧五代史》原本,知其书明清之际尚有存本,而近人歙县汪氏亦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先生展转寻访,形诸梦寐,卒无所得,引为终身憾事。然则此七种校勘记之损失,先生地下有知,亦当为之不安。据绍曾蠡测,此七种校勘记,既未化为劫灰,则未必不在人间。倘一旦果能发现,延津剑合,失而复得,岂独先生之幸,亦我国史学界之大幸也。

商务印书馆林尔蔚总经理,于弘扬传统文化,素具宿愿,若干年来既将先生遗著,陆续付诸剞劂,并出版先生传记、年谱,以《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为先生毕生心力所寄,且于史学贡献至巨,目前虽已遗失七种,仅存之十六种必须及早抢救,整理出版。因绍曾三十年代初曾预校史之役,而校史处同仁咸已物化,昔日侍坐先生获聆绪论者惟绍曾一人。爰将整理校勘记事宜委诸绍曾。绍曾自惟学识谫陋,且年已老耄,何敢膺此重任。经商诸古文献整理小组杜泽逊、王承略、刘心明诸君,俱愿为此戮力分劳,并先后得程远芬、赵统、李士彪、邵玉江诸同志响应,由绍曾总其成,并征得顾起潜先生同意,最后请顾老审定。事既集矣,爰商定此十六种校勘记,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前四史,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六史,第三阶段为隋、唐以下六史。先就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分别将衲本、殿本异文逐一覆核订

实集校勘家之大成，继卢、孙、顾、黄之后而独辟蹊径。此十六种校勘记一旦公诸于世，先生校史之功不难一一覆按也。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后学王绍曾谨识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济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虽未及捡各史对勘，而正讹补夺，厘然有当于心，若举百数十册之校勘记次第整理印行，则吾哥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者益无限量。"①

1927年至1930年间，胡适在上海，与张元济为邻。当他向张借到《旧唐书》校本之后，说："先生的校注极有用处。如李白一传，殿本脱二十六字，正是极重要之文。少此二十六字，此传遂不可读。……倘非得先生用宋体校补之本，我竟不知此传的本来面目了。"②1930年他看到《衲史》样本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评论：《廿四史》百衲本样本，今早细看，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于每一史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加不止百倍。……校勘之学是专门事业，非人人所能为。专家以其所得嘉惠学者，则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然后可望后来学者能超过校史的工作而作进一步的事业。"③

远在广东的汪兆镛读了《衲史》样本后，欣喜之余，撰写成《百衲本二十四史题记》，称"菊老苦心搜讨，多历年所，俾正史善本，集腋成裘，故以百衲名。复详加校勘，句梳字栉，标揭样本中，学者由此津逮，于考史之功，裨益不浅"④。

现代几位史学、文献学家也都对《衲史》有较高的评价。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称之为"保存宋元以来所刻正史之大结

① 蔡元培致张济书，1939年5月25日，原件。

② 胡适致张元济书，1927年12月10日，原件。

③ 胡适致张元济书，1930年3月27日，原件。

④ 汪兆镛：《百衲本二十四史题记》，1930年6月，手稿。

二十四史提要(节选)

王健群

二十四史的由来和编制体例

一　二十四史的由来

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史书也十分丰富。其中很多已经失传了。单就长期流传到现在的史书来说,数量就非常之多。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仅就这一部分就有3239卷,字数约在千万以上。

所说的二十四史,是24部历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合起来是一部极大极大的书,分开来也是24部相当大的书。这部大书,是从汉武帝时起,到清乾隆初年止,经过历代历史学者逐次编著积累而成。唐以前常把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合称为“三史”。后来加上陈寿的《三国志》,又称为“四史”。到北宋,加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13部书,合称“十七史”。明朝增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二十一史”。清朝增入《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经当时的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从清朝

“世家”，封王封侯的人立国以后，子孙世袭，所以叫世家。这部分的各篇记载，包括列国诸侯和地位相当于诸侯的人在内。从每一篇来看，有些实际是诸侯的“本纪”，有些则和列传相类似。

“列传”是记载人物的活动，它和本纪、世家不同。后二者所记涉及到国家或地区的整个范围，前者只限于立传本人接触的事物。主要是记述他们的乡里、宗谱、生卒、官爵和一些有关史实；有的也记载他们的言行、著述。列传基本上分4种。第一种是一人一传；第二种是两人以上的合传；第三种是类传，记载事状相类的人物。其实第二、第三两种也还是为单人立传，只因事状相类，把他们的传排列在一起就是了。类传又加上总的名目，如文学、循吏、方技、隐逸、列女等等。第四种是记载国内少数民族的传，或一部族立一传，或几个族合一传，如匈奴、西南夷等，也有称为“蛮夷传”或“外国传”的。

列传记载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有的史书也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但不称叛逆，即称流贼，多数是加以贬斥和诬蔑的。

“志”是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凡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礼乐风俗，自然景象，水陆建制等，都前后贯穿地记载下来。每一篇志都是一种专史。所以志是纪传体史书中很有用的部分。各志中，食货志是记载田亩、户口、生产情况和经济制度的；艺文（或称经籍）志是记录古今书目的；礼、刑法、百官（或称职官）、选举、舆服、仪卫、兵等各志是记载当时各种政治制度的；释老志是记载宗教活动情况的；天文、历志是关于天文、历法的记载，属于自然科学，其中保存了很多学术文化上的宝贵遗产，但也有很多地方歪曲地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符瑞、五行二志是用灾异或自然现象的变化来欺骗、麻痹人民，宣

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曾对二十四史整套书或其中几部书作过评论。应该承认，他们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见解，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是有贡献的。但他们主要的缺点是大多以形式代替内容。很多评史的人都不问每部书的内容如何，只是强调文字是否简洁，断限是否得当，列传人物前后次序编排是否适宜，标目是否恰当等等。尽用这些来评定一部史书的优劣，那就掩盖了内容实质，做出歪曲的论断。

有时他们也谈到所谓“书法”和“史识”问题，就是写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评论者和那些编撰者同是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人物，所以在维护反动阶级利益的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根本不会提出更正确的意见。他们评论“书法”，商量“史识”，多是强调这部史书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人物推崇得够不够高，对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的人物骂得够不够劲，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违背了“圣贤”之道，以及以曹魏为正统对还是以蜀汉为正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不管他们怎样争论，总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过去“史评”一类的书，多数有这种缺点。

我们今天读二十四史，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分析各书的内容，对它做出新的评价。

一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二十四史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积累而成的一套有系统的珍贵的史书，是我们祖先两千年来留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全书有3239卷，字数在千万以上，真是煌煌巨著，是中国历史知识的宝库。

对历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妄自菲薄是不应该的。

二

我们又必须承认，一套二十四史都出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之手，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史书标准。今天我们阅读这套史书，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有很多地方要给予批判。

第一，要批判各史中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在封建学者的观念中，总以为广大人民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是天经地义的。国家被看做帝王的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把帝王将相看作是整个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主要记载这些人。偶尔记载些劳动人民的事情，也总是加以丑化，缩小他们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反面人物"记载下来的。这样的记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我们今天要把它鉴别出来另作评价。

第二，要批判有些部分记载失实。二十四史大部分是在封建王朝的监督下写成的。不是"监修"，便是"奉敕撰"。修史的人慑于政治威力，为了取悦帝王、贵族，凡是与当权者利害攸关的前朝往事，多不敢直书。沈约写《宋书》的时候，"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梁武帝便对他说："我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沈约便把那些鄙渎事都删掉了。这便是很好的说明。另外，各部史书的本纪多依据前朝实录。实录源于起居注。历代皇帝都有起居注，由专任的官记其言行和有关事件。这些记录要时时进呈，当然也要经过"宸断"，所以记的都是"嘉言懿行"，所谓"圣人之言，可以为万世法者"。谁敢记皇帝的恶言恶行，惹皇帝的怒火。皇帝死后，

（续表）

书名	修撰人	例目					总卷数	书中起讫年代（追溯者不在此限）
		本纪	年表	书志	世家	列传		
宋史	元脱脱等	47	32	162		255	496	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960—1279）
辽史	元脱脱等	30	8	32		45	另有国语解1共116	辽太祖神册元年至天祚帝保大五年（916—1125）
金史	元脱脱等	19	4	39		73	135	金太祖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兴三年（1115—1234）
元史	明宋濂等	47	8	58		97	210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至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279—1368）
明史	清张廷玉等	24	13	75		220	332	明太祖洪武元年至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368—1644）

（王健群著《二十四史提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至费时考订才能决定。如果史学专业工作者对每段每句都要花功夫推敲文字，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进度。校勘与标点一样，也是一件有意义的整理工作。二十四史传抄传刻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脱漏颠倒，甚至成行整页的脱落。有的因一字之差弄得文义史实全非。因此过去的史学家早就注意校勘，做出了不少成绩。这次整理二十四史，力求吸取前人成果，并用几种较好的版本，结合其他史籍进行内外校勘，尽可能改正旧版的错误，并撰写校勘记，说明依据。不能改正但可供参考的，都记录下来，供读者参阅。史学研究者阅读二十四史，未必翻阅众本。即使要翻阅，也未必都能找到手。因此，整理时用几种版本对校，重要异文做出记录，就为史学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方便。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扫去还生。"我们的校勘，免不了有失当之处，只能说通过这一工作，有了一个经过初步整理的新本。

应属下句读。青州有东阳城,"东扬"必是"东阳"之误。经过查核,果然金陵书局本、《南史》、《册府元龟》431卷均作"东阳"。我们体会到,标点是一种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句一逗都要对读者负责。

既要吸取前人成果也要创新

孙毓棠　杨伯峻

汇集和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是提高校勘质量的必要手段。成书愈早的史书，前人校勘和研究成果也就愈多。如《史记》、《汉书》，汉末魏晋以来，不断有人校释，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功力都很深。有关《史记》的前人成果就更多了。这次整理二十四史，各史在吸取前人成果方面下了一番工夫。如《史记》，集中吸取了张文虎的成果，《后汉书》注意吸取了王先谦、沈家本、李慈铭、张森楷等诸家的正确见解。吸取前人成果，并不能代替我们的创新。遇到是非难辨、真伪不明的问题，就得加以研究，在纷繁庞杂的材料里，理出头绪，分清是非，还史书的本来面貌。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创新。既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有所创新，经过点校的二十四史就可以超越任何一种旧版本。

安'之误,今改正。"我们认为,向读者作这样简明扼要的改字说明,不能视为繁琐考证。繁琐考证还是科学考证,不能依条目多少和文字众寡而论,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看是否正确和有无必要。充分进行科学的考证,是提高校勘质量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史，这在世界上是极罕见的。司马迁的《史记》为以后各史的编修奠定了基础。这不仅因为《史记》是最早成书的一种，更重要的是它开创的纪传体，为《汉书》以下各史所因袭，它的编写方法，也为后来史书所模仿采用。纪传体是在历史编纂学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史体，它虽然形式上以人物为中心，实际上却是兼备众体，除“列传”以外，还有编年记事的“本纪”，专记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来补充纪、志、列传所不能尽详的“表”。纪、志、表、传互相发明补充，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从而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状况。有些史缺少志、表，却毫无例外地都有纪、传，因此把这套史书称为纪传体史书，是名副其实的。

应当指出，二十四史并非24个朝代的史书。有些书的内容是交叉的，如西汉前期的历史（汉武帝以前），既载于《史记》，也见于《汉书》，后者就是以前者为蓝本增删而成。又如《南史》是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书的综合改编；《北史》是北朝魏、北齐、周、隋四书的综合改编。还有两部书同记一朝或一个时期的史事的，《旧唐书》和《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就是如此。无论是交叉的也好，同记一个时期史事的也好，都不能看作简单的重复，而是互有短长，各有特点。我们使用这些书的时候，应当用来相互补充，不能偏废。

就编写情况来说，二十四史可分私修和“官修”两类。私修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作者是谁，那是一清二楚的。至于“官修”的书，情况就不那么简单。这种“官修”，一般应由“宰臣”监修，书成之后，照例由他领衔送给皇帝过目，因此他就俨然成为这部书的作者。其实许多监修人在修史工作上并没有出过多少力，比如《旧唐书》领衔的刘昫、宋辽金三史领衔的脱脱等，就都和本书沾不上什么边。但其中也有做过一些工作的，如

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由于这部巨著过去没有标点分段，今人读起来比较困难；而且版本很杂，歧异很大，舛误、遗漏以及被人错改的地方也很多。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便于阅读、错误少、较为接近原貌的本子，对它进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历史研究和历史遗产的批判地继承，二十四史的整理，就是毛主席交办的任务，而且又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工作的。二十四史的组织点校，开始于1958年底；在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这套史书的第1部点校本《史记》就和读者见面了。此后陆续出版了《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到1966年上半年，完成了《南齐书》、《陈书》、《周书》的点校付型，《梁书》、《北齐书》也基本上定稿。其余各史，也程度不等地作了点校或必要的准备，其中《晋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辽史》、《明史》都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已接近完成。“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也陷于停顿，连已出的四史也被打入“封资修”行列，从书店里消失。到了1971年，周总理力排“四人帮”的干扰，亲自过问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总理明确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写了报告，周总理审阅后立即送呈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正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才得以恢复，未完成的各史的点校本才能够陆续出版。先后参加点校的同志，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

不应该要求在校勘范围里加以解决。殿本二十四史卷后所附的考证,就没有注意区分两者的界限,有些条目属于校勘,有些条目纯属史实的注释和考证,漫无体例,结果哪一项内容都挂一漏万,未臻完善。

校书质量的好坏,与能否运用科学的校勘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前人在校书实践中,创造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根据各史的特点和每一具体问题的要求,灵活地采用了这些校勘方法。

就全史的校勘来看,整理者把对校作为最基本的方法。所谓对校,就是确定一个误字较少的版本作为工作底本,然后选择本书其他版本来校录异同,判断是非,改正文字错误。这是校书简便而又稳妥的基本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用这一方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异文,订正了很多史文的讹脱衍倒。前人使用这种校勘方法,往往喜欢把他本与底本的异同,一一照录,正误杂揉,校勘记繁芜,使人不得要领。新本二十四史就没有这种弊病,底本不误而它本误的,一律不撰写校勘记。但底本不误而它本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还是加以收录。这既荟萃了各种版本的长处,又使校勘记比较简洁。

本校也是新本二十四史经常使用的方法。本校是指以本书前后相互校证,从中发现和纠正错误。二十四史是用纪传体编写的,本纪记载帝王的政迹,列传是人物传记,表谱列书中的人物和史事,志叙述典章制度,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联系。整理者掌握了这一特点,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旧本《三国志·孙和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诸葛丰伪叛以诱魏将诸葛诞。"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丰的事。据《孙权传》裴注所引《江表传》:赤乌十年,孙权"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诸葛丰是诸葛壹之误。整

各朝历史的小结;《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是小结了中国史上又一次分裂割据状态下,在中原地区各朝相继过程中和中原周围的各朝间的地区性的局部政权之间的历史。以上3个小结性和阶段性以及地区性的历史,都是通史性的。除了这3次小结的5种史书以外的十九史,都是在统一状态下,一朝一代逐次编纂的年系前后衔接连贯的历史,是属于断代性的。无论通史性的或断代史性的,都体现出一个规律:统一是长期性的,分裂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分裂走向统一是必然性的;每次大的或小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的分裂,其结局必然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出现和巩固;必然使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的继承性呈现着加强;必然使民族之间的融合更加广泛化和深刻化。这就体现出,各民族在缔造祖国的历史和对世界文化的繁荣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四史全书共计3266卷(包括子卷、《后汉书》年表和目录卷)[①],字数在千万以上。二十四史属于中国史书三大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之一的纪传体。所谓纪传体是以纪和传为主,即以写人物的活动为主体的史书,也包括志、表、自序和史评等6个方面。由于编纂者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和历史特点的关系,故在各史的体例上有大的统一性和小的差异性。二十四史的第一史为司马迁撰的《史记》。《史记》的体例为以后的二十三史做出了典范,后来的史家多仿《史记》的规格作为模式。《史记》中全具备了纪、传、表、志、自序和史评6个方面。《史记》以下的二十三史,基本上也包含以上各个方面,但也有并不完全具备以上6个方面,也有的缺少某一方面的某些部分,有的在某

---

① 《辞海》和《辞源》对二十四史卷数算法不一,应以《辞海》中的计算方法为好。

数民族列为《匈奴列传》;把川西和云贵一带诸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并为之立列传;对闽浙地区诸民族立《东越列传》;对中国东北边疆及边疆毗邻的朝鲜族立《朝鲜列传》。以后各史皆仿《史记》的体例而为边疆各族立传的,有称西域的,有称四夷的,有称夷蛮的,有称诸夷的,有称南蛮北狄和东夷的,有称外记和外国的。古代内、外界线和国界不确切,不是现代意义的内外。但总的来说,其标名外国字样的,还是和蛮夷可以区分开来的,如《史记·大宛列传》和《明史·日本列传》等。

二十四史中共有的传现分述如下:

《宗室传》:首创于《汉书》。无此传的,有《史记》、《新五代史》和《元史》凡3史;有称《王公传》的仅《三国志》1史;有称《诸子传》的,仅《晋书》1史;有称《诸子宗室传》的,仅《宋书》1史;称《宗室列传》的,凡18。

《循吏传》:无此体例的计有《三国志》、《陈书》、《周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凡5种。称《良吏》的,有《晋书》、《宋书》、《梁书》、《魏书》、《旧唐书》和《元史》凡6种。称《循吏》的,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和《明史》,凡11种。

《酷吏传》:《史记》首创《酷吏列传》。二十四史中,有《酷吏传》的,凡10种:《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金史》。其余14种史中无《酷吏传》。

《儒林传》:《史记》首创。无《儒林传》的,凡7种史,如《三国志》、《宋史》、《南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和《金史》。称《儒学传》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和《元史》,其余14种史均称《儒林传》。

《刑法志》:二十四史中有此志的12种。无此志的也是12种:《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新五代史》。

《五行志》:无《五行志》的,计有《史记》、《三国志》、《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和《辽史》共10种史;余13种史均有此志。

《地理志》:二十四史中有此志的,大部分皆名《地理志》;《后汉书》名《郡国志》;《宋书》和《南齐书》名《州郡志》;《魏书》名《地形志》;《旧五代史》名《郡县志》;《新五代史》名《职方考》。无《地理志》的是《史记》、《三国志》、《梁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和《北史》。

《艺文志》:名《艺文志》的有《汉书》、《新唐书》、《宋史》和《明史》。名《经籍志》的有《隋书》和《旧唐书》。余均无此志。

《百官志》:《史记》、《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新五代史》无此志。《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和《明史》名《职官志》。《魏书》名《官氏志》。余8种史名《百官志》。

《舆服志》:有此志的凡9种史,即《后汉书》、《晋书》、《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和《明史》。《新唐书》名《车服志》。余14种史均无此志。

《祥瑞志》:《宋书》名《符瑞志》。《南齐书》名《祥瑞志》。《魏书》名《灵征志》。余21种史均无此志。

《仪卫志》:有此志的凡5史,即《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和《明史》。余19种史均无此志。

《选举志》:有此《志》的凡6种史,即《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余18种史均无此志。

多样的。从这样发展变化的研究中,来推进对二十四史的学习和研究,来开拓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的广阔园地,使我们对中国史学有一系统的概念。

(《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档案与二十四史

倪道善

二十四史是古代封建帝王钦定之正史，誉冠史林，独领风骚，上起黄帝下至明末，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融汇贯通，相承不辍，千古不朽，展示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说起二十四史，可谓家喻户晓，村夫野老也略知一二。但说起档案，则知之者甚少，遑论其与二十四史之关系，犹仰长城之雄伟而不见砖石，叹林莽之浩渺而不辨草木。今之所论档案与二十四史，即砖石与长城，草木与林莽也。

一　二十四史的体载源于档案文献

24 部正史皆为纪传体的史书。纪传体是古代“三大史体”之一。它以“本纪”记帝王事迹；以“表”图示各历史时期简明大事记；以“书”或“志”分类记国家典章制度；以“世家”记诸侯、贵族、割据政权及个别特殊人物；以“列传”叙列著名历史人物及少数民族事迹。五体汇一，相辅相承。纪传体发端于第 1 部正史《史记》，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创始者，这为不争之史实。但是纪传体并非司马迁个人的发明，它与古代档案编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春秋以前，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图书，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应属于档案文献。相传上古时期已有史官掌管著作，所谓“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所记之物亦是档案，即使流传下来的《尚书》、《春秋》等，也是根据三代史官所存文件编成的。史官的不同记录方式和对档案文件的不同编纂方法，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档案文献，遂成为后世史籍的雏形，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两种。”司马迁之前，纪传体中的5种体例早已有之，诸如《禹本纪》、《周谱》、《帝王诸侯世谱》、《周礼》、《世家》、《穆天子传》等等。论其性质均属档案的编纂之物；按其内容体裁则分属“纪”、“表”、“书（志）”、“世家”、“列传”。司马迁吸取各体之优点，改造发展，创作出纪传体的《史记》。其中，“本纪”取法《禹本纪》；“表”仿效《周谱》。汉人桓谭《新论》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关于“书（志）”，唐刘知幾认为“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范文澜《正史考略》认为“八书之书，本于《尚书》”，“取《尚书》之《尧典》、《禹贡》”。关于“世家”，《史记·卫世家赞》中有“余读世家言”之说，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古来本有世家一体”①。关于“传”，战国时已有为人作传之例，晋太康间汲冢所得《穆天子传》一卷，记周穆王西巡之事，按日记事，体例与起居注相同。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总括本纪、表谱、世家、列传等体例于一书的《世本》，对纪传体的创立影响很大。《世本》是根据古代史官记录的档案材料编成的，原称《世》或《经世》，是各国王侯贵族世系的记录，内容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纪》、《世家》、《传》、《氏姓》、《居》（记都邑）、《作》（记发明创造）、《谥法》等。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纪传体是由《世本》发展而来。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相乘也，工矿粮食之储，国不乏用也，经世牧民之士，代不乏才也，然而乱国恒多，治国恒少，亦朝五季，作为厉阶异族杂种，窃窥禹甸，前车不鉴，后轸方遒，岂不以淫辟相循，昏庸未悟，溃金隄于蚁穴，启篝火于狐鸣，而后率土离心，人情思乱矣。然则治史者寓褒贬于已往，证得失于将来，以扶伦纪，以遏乱萌，处经事而得其正，处权事而得其变，安危所制，划若分疆，几务未乘，洞如观火，非考古之精祥，必临时而瞀乱，史论之作，乌可已哉！若乃度时势为变通，揆机宜为因革，宽猛异用文质殊崇。与夫封建郡县，田赋兵刑，世不相沿，代不相袭，是又可错综参伍，博观其略，而夸典核，猎文词者不与焉。此徐君振流既著是书，予为撮其微旨，弁之首简，惟其详论各史之得失，义例之是非，则原书俱在，兹不赘述云。

蕲春方觉慧序于渝之慧庐。

（原载徐浩《廿五史论纲》，世界书局1947年版。今选自上海书店1989年版）

正史之缺憾，赖古今学者之努力，受其弥缝者已不在少数，后人尽可利用已有之成绩而作进一步之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绩，将何从而求得之？忆十年前，颉刚好治目录学，于各史艺文志之补证毕力搜寻，然而补《晋志》者，秦荣光、黄逢元二本未有闻也，文廷式之本则蕴之于心而未有见也。游浙江图书馆，见姚振宗诸稿，意恋恋而不能得也；怅惘盈怀犹如昨日事。夫居于五都之市者尚艰于汇合如此，况在僻壤，志学之士有不抱漏迮之书以终古者耶！盖此诸作，作非一人，人非一地，地非一时，往往散见于丛书全集之中，非有力藏书者不易具备；其刊为单行本者，则卷帙短薄，随时有亡失之虞；至于孤留之稿本，则即在亲戚姻娅间亦有不得睹者矣。以材料之不集中也，故读史者欲觅其一种，恒东西寻索，空手而归；谓非学术界之大憾事乎！

四十年前，张之洞总督两粤，开广雅书局于番禺，所刻书以史学著述为最多，彼盖有志继阮元《学海堂经解》之业而为是"史藏"者。其后离粤，未立总名，上海书肆集其史部而石印之，颜曰《史学丛书》，凡二集；为其但供试场之用也，影缩过小，可检而不可读。颉刚幼时见之，诧为奇观，以为清人考史之书网罗尽矣。稍长，好聚目录，乃知此类书未刊者尚多。及游学北平，往还之师友多治史者，益见珍秘之籍，而惜其不得汇合于一编。私计《学海》之后复有《南菁》，不审《广雅》之作亦有嗣音者乎？顾瞻八表，实劳我心。今春过沪，于开明书店见《二十五史补编》之目，知旧友王伯祥先生（钟麒）主持斯事，俾与缩本二十五史并行，以便读史者之相互勘证，从此无患乎原书之阙漏，亦无惑乎原书之违迕；搜罗之博，远轶《广雅》，凡兹世所能致者几于无不备焉，为之喜而不寐。夫为昔人著作谋尽其用，为后来学术广辟其门，使材料不集中之苦痛从而解除，此真无量之功德，所当为史林永颂

艺文志》史部史钞类著录，用“十七史”名书者有，周护《十七史赞》，佚名《名贤十七史确论》；子部类事类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宋人虽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取代《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位置，但事实上后者仍未废置。朱熹针对科举科目提出：“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宋史·选举志二》）十七史在金朝统治范围内同样受到重视，其科举考试，“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杨、老子内出题”，并对十七史版本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即“《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金史·选举志一》）。从这里可以看出，金朝所谓十七史，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而无《南史》和《北史》，这是它跟宋人所说的十七史的异同所在。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意在本于宋元人十七史之说，但其所考、所论，还是不免要涉及到《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事实上实为“十九史商榷”。

二十一史和二十二史。二十一史之说始于明代，它在宋人所谓十七史的基础上，又增加元修宋、辽、金三史和明修《元史》。明朝南北国子监先后在嘉靖初和万历中，分别刊刻二十一史，世称“监本二十一史”。于是，“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清乾隆四年（1739），《明史》修成，合为二十二史。考史学家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所考含《旧唐书》而不含《明史》，跟上面说的二十二史不同。另一考史学家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所论包含了《旧唐

和他父亲班彪，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司马迁《史记》的通史写法，认为这是把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大大贬低了。因此，《汉书》的断限，“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史事；认为王莽的出现只是“遭汉中微”的一个历史插曲，跟秦朝一样“同归殊途”。班固以“书”名汉史，意在仿效《尚书》之义，希望《汉书》对于汉朝来说，也是一种“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的关系。这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增强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

第二，撰述的重点是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从西汉建立至武帝太初，约百年左右，《汉书》续作了太初以后约 130 年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尤其是班固的贡献。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所补充、调整。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班固说，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 12 世 230 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主旨。在内容上，它写出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历史，首尾完整。在结构上，它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 4 个部分。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是班固在撰述上的思想和要求，这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尤为突出。《汉书》断代为史，但其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注意到承上启下的问题。《高祖纪》后论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说明承上之所由

上评论《汉书》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隋唐之际，"《汉书》学"成为专门之学，形成了人们学习、研究史书前所未有的高潮，以至于出现了有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的盛况（参见《隋书·儒林·包恺传》）。刘知幾又从学术史上评论《汉书》的地位说："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史通·古今正史》）

《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这种以多种体例相综合的史书表现形式，对于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表明中国史家对于整体的历史之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汉书》适应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在《史记》的基础上，断代为史，并在表、志方面发展了《史记》的成果，使纪传体史书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方面更加丰富起来，从而确立了皇朝史的规模和格局。它们在史学上的双峰突起，大为后人所瞩目。《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篇后序在讲到西晋陈寿撰《三国志》以后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史记》、《汉书》对于正史发展之影响力的巨大，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

三　关于《后汉书》和《续汉书》志

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后汉书》，是包括范晔撰写的《后汉书》纪、传90卷和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志30卷，这两部分合为120卷，记东汉一朝史事。

最早的东汉史，是自班固至蔡邕等许多东汉史家不断撰集的

西)人。他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晋书·司马彪传》)。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司马彪撰《续汉书》时,可参考者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等,故有"讨论众书"之说。《续汉书》的志有八目: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其中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官簿",其渊源当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关。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目,也由《汉书·地理志》而来。《续汉书》八志被刘昭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备矣"(《〈后汉书〉注补志序》)。

《续汉书》志在撰述思想上,一是注意阐述典章制度的变化和联系,如《郡国志》"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易,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重在"粗注职分",比《汉书·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有所发展;《舆服志》通记"上古以来"车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二是强调"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这在《礼仪志》、《舆服志》中有突出的反映。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奢广"和大规模封禅活动(见《百官志》、《祭祀志》)。这些,都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

刘昭把《续汉书》八志析为30篇,以补《后汉书》无志的缺憾,从而也使《续汉书》志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史学上是有双重的贡献。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

史迁不足方也”(《华阳国志·后贤志》)。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尔,要终胜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清人李慈铭评论道:“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这些评论在高低分寸上很不一样;但总而论之,他们以《三国志》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相比,已表明它们确有可比之处。后人把它们统称为“前四史”,是有史学上的根据的。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国志注》,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三国志》的续作。

五 关于《晋书》

晋史撰述在东晋南朝时期,是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最有代表性的。今可考者,这时期出现的晋史撰述有24种,东晋史家和南朝史家所撰各占半数,纪传体和编年体亦各占半数。纪传体晋史有: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谢沈《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南朝齐臧荣绪《晋书》,梁萧子云《晋书》、萧子显《晋史草》、郑忠《晋书》、沈约《晋书》、庾铣《东晋新书》。编年体晋史有:晋陆机《晋纪》、干宝《晋纪》、曹嘉之《晋纪》、习凿齿《汉晋阳秋》、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南朝宋刘谦之《晋纪》、王韶之《晋纪》、裴松之《晋纪》、徐广《晋纪》、檀道鸾《续晋阳秋》、郭季产《续晋纪》。这24种晋史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如谢灵运、萧子显、沈约、庾铣等

分立，迄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隋之代周，包括了西魏、北周两朝史事。令狐德棻除主撰《周书》外，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四史。

《隋书》纪5卷、传50卷，唐魏徵(580—643)等撰，贞观十年成书，是“五代史”之一。其记事，起于周隋“禅代”(581)，迄于大业十四年(义宁二年，618)唐之代隋，是首尾完具的隋史。它的史论，以及梁、陈、北齐三史帝纪总论，都是魏徵撰写的。《隋书》的志，即《五代史志》10篇30卷，唐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贞观十七年(643)奉诏撰，成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隋书》志的内容，包括了梁、陈、齐、周、隋5个皇朝的典制而以隋为重点。

《南史》80卷、《北史》100卷，唐李延寿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早有“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计划，直到贞观二年(628)临终，“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延寿因“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利用长期在史馆修史的机会，“推究”、“披寻”南北朝各史，撰成《南史》纪10卷、传70卷，《北史》纪12卷、传88卷，经令狐德棻推荐，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奏上。高宗为之作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以上这10部正史，合计746卷，几乎占了二十四史总卷数3239卷的四分之一。至于“八书”、“二史”这一提法，在清代已颇流行，并非始于今日。《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张应昌《〈南北史识小录〉补正》序：“以‘两史’及‘八书’较之，间有误处，辄为正之。”(同治十年武林吴氏清来堂校刊本)

称为《内起居》。孝明帝正光(520—525)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教,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

其实,僧寺并不是人民的"天堂"。在那里,等级的森严和阶级的对立,与世俗无异。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而寺院经济也就成了封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朝统治者中梁武帝是佞佛的典型代表。《魏书·岛夷萧衍传》说他不仅大建僧寺,还"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国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他为"皇帝菩萨"。其发昏、出丑皆类此。

在僧寺香烟弥漫着大江南北的迷雾之中,生活在齐、梁之际的伟大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勇敢地向佛教经论宣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写出了不朽的《神灭论》,对佛教谎言作了无情的批判,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邀集朝贵及名僧64人,与范缜辩难。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梁书·范缜传》全文记载了《神灭论》。《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补充了范缜不愿"卖论取官"的千古名言,二者相得益彰,显示了这位朴素唯物论者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重门阀,崇佛教,是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腐朽、空虚、没落的表现,反映了一种衰颓的社会风貌!而广大人民的为佛教所欺骗,则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使然。

等国史体例，立武则天为本纪，不采唐史家沈既济以武则天事入皇后传之说。志11篇，包括礼仪、音乐、历、天文、五行、地理、职官、舆服、经籍、食货、刑法，在见识和编次上均不及《隋书》志。列传以多人合传为主要形式，中唐以前人物，分合有序，可窥匠心。类传有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等。关于民族与外域，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北狄诸目，写出了唐代广泛的民族联系和丰富的域外知识。

《旧唐书》在历史思想上有值得重视的地方。首先，它对于得失兴亡的认识，不怎么讲到“天命”，而强调“治乱，时也；存亡，势也”（《则天皇后纪》后论）。比之于《隋书》，它的“天命”痕迹要淡化得多。其次，它对于唐代历史上一些影响到政治得失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分析。这在《宦官传》、《酷吏传》、《儒学传》、《文苑传》等类传的序中有突出的反映。《宦官传》序揭露宦官集团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昭宗之季，所不忍闻”。第三，它对待民族关系的看法，认为应当从历史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北狄传》后论）又说：“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南蛮·西南蛮传》后论）它还提出“理乱二道，华夷一途”的见解（《突厥传》后论）。一方面强调自身的“德”，一方面对“夷”也不一概骂倒。这固然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可以看出自隋唐以来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旧唐书》作为第一部记述唐代历史的著作，虽有不少粗率的地方，但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文献，写出了7世纪初至10世纪初

亡。全书包括:梁书纪、传24卷,唐书纪、传50卷,晋书纪、传24卷,汉书纪、传11卷,周书纪、传22卷;世袭列传、僭伪列传,记与“五代”大致同时存在的“十国”史事;还有关于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列传,以及志12卷,记五代典制。

《旧五代史》行于两宋,元代以后逐渐不行于世,清修《四库全书》时即无原本可据。上面所列其结构、卷帙,以及现今流传的本子,是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编次,又以《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所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而成。

在编纂上看,《旧五代史》以五代史事相次,不同于《三国志》的“三国”分述;它也不同于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各自独立成书,而且还有世袭、僭伪列传记述“五代”以外的“十国”史事。它的纪、传部分,在结构上更近于《南史》、《北史》。这是它在编纂上的特点。它在10篇志中,立《选举志》,以明“审官取士之方”,这是受到《通典》的启发而在正史的志中属于首创。大致说来,《旧五代史》在反映五代十国这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

《旧五代史》多取材于五代实录,撰人又多是五代仕进之士,修撰时间去五代之亡不远,故资料丰富,叙致详赡。纪之详,志之备,是它在内容上的两个特点。其纪,五代共为61卷,内中《唐书·明宗纪》长达10卷、《梁书·太祖纪》有7卷、《晋书·高祖纪》和《周书·世宗纪》都是6卷。这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其志,以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比较重要。《食货志》写出了对赋役、田租的整顿,《刑法志》写出了刑法的紊乱和整饬,《选举志》记载了五代“审官取士之方”,《职官志》记载了五代之命官及其“厘革升降”的情况,《郡县志》反映了这个时期地理建置的

政几何其不坏矣","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新五代史》卷一二后论)。另一个方面是以史法明道义,以正乱世之非,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贯彻"道学"的要求。故作者于《新五代史》卷九后论中,不惮其烦地解释"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这句话,并两次引用礼书以证其说。《新五代史》独创《家人传》,意在揭示"亲疏嫡庶乱矣"(卷一三《梁家人传》序)。欧阳修论评价五代时期历史人物说:"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为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卷二一《梁臣传》序)孔子修《春秋》,其属辞,有一定的例,但孔子是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而这里,欧阳修是真正要在历史撰述上寓褒贬于一字之中了。所有这些,在历史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当然,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对于史学的影响。

《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12卷)、家人传(8卷)、大臣传(11卷)、类传(7卷)、杂传(19卷)编次;还有《司天考》(2卷)、《职方考》(1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10卷),及年谱(1卷),记"十国"史事;四夷附录(3卷),记少数民族。《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炼。这两点,是它的长处。但其伤于过简,叙事难得丰赡,从而削弱了史书应有的分量。这是它不如《旧五代史》的地方。

《宋史》。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王鹗就有撰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元世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建立了修史机构。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撰修辽、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见成绩"(《元史·虞集传》)。这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关系难以确定。当时人们的主张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宋为正统，仿《晋书》体例，以辽、金为载记；一是效《南史》、《北史》之法，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所谓"义例"，本质上是正统问题(参见《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直到元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脱脱等人再次奏请撰修辽、金、宋三朝史书，顺帝随即下达有关撰修三史的诏书，这项工作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陆续撰成三朝正史。而三史凡例的确定，则实为关键所在。这上距修辽、金二史之议，已近80年了。

修三史诏着重讲了纂修辽、金、宋三朝历史同元朝统治的关系，指出：辽、金、宋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这是明确表明了元皇朝的现实同辽、金、宋三朝历史的联系。诏书还强调了要选拔"文学博雅、才德修洁"的人参与纂修，同时任命右丞相、监修国史脱脱为都总裁，并任命了总裁官和提调官，负责修史事宜和提调购求辽、金、宋三朝实录、野史、传纪、碑文、行实等散在四方者。诏书最后要求总裁官、修史官商订修史凡例。这篇诏书，显然是总结了数十年中议修三史的得失，故对修撰宗旨、史职任命、文献搜求、撰述凡例几个重要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容,保存了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总的来看,《金史》志在特点上不如《辽史》志鲜明,而在内容的翔实上则过之。而《辽史》的表在内容上则比《金史》的表显得丰富。《金史·交聘表》写金朝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辽史·属国表》的姊妹篇。

《金史》列传比《辽史》列传也来得丰富。它写的许多人,都是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不开的,因而在表述和评价上有更多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金史》撰者突出地强调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金史·忠义传》序是最能反映这个思想的,它指出:"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者圣元之为政也。"这个思想,明载于《三史凡例》之中,其《忠义传》所记人物,多属此类。《金史》也为张邦昌、刘豫原是宋臣这样的人立了传。于《张邦昌传》,先交代他"《宋史》有传",然后简述其在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被金朝立为"大楚皇帝",最后写他被宋高宗"罪以隐事杀之"。于《刘豫传》,先写他在宋的仕进,继而则写他杀宋骁将关胜而降金,写他天会八年(1130)被金立为"大齐皇帝"、献逼宋主之策,以及天会十五年(1137)"大齐皇帝"被废,降为蜀王,最后贬为曹王,直至于死。所有这些,一一照书。但在后论中,撰者则明确地评论说:"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刘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这是从君臣名分和个人道德上对张、刘二人进行谴责,而且由此也批评了辽、金的最高统治者。处在元代后期

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总结了它们的兴亡盛衰之故，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一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历代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 关于《宋史》

《宋史》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与辽、金二史同时始修，至正五年（1345）十月二十一日成书奏进。它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

《宋史》的撰修，仍是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为总领，脱脱为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为总裁，参与撰写的史官有斡玉伦徒等23人。卷帙如此浩大的《宋史》，在短短的两年半中修成，主要原因是依据了宋代史馆已有的国史旧稿。《元史·董文炳传》记：元灭南宋时，董文炳率军入临安，对奉元世祖之诏招宋士而至临安的翰林学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以备典礼。"于是，"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董文炳不仅是元朝平宋的功臣，也是保存宋史文献的功臣（参见《宋史·瀛国公纪》）。元朝史臣，根据旧史文献，"编摩分局，汇粹为书"。他们修撰《宋史》的主旨是："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宋代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元朝史臣中多有崇奉性命之说的，故于修撰《宋史》，乃着重申明这一原则。

宗，殊为难得。撰者对于两宋历史之总的认识，一方面说“赵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敝失于弱”；一方面又说“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瀛国公纪》）把北宋之弱归于“以仁传家”，把南宋的存在归于“礼义”和“恩惠”，这种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物质生产而空言“性命之说”的看法，暴露出撰者历史见解上苍白的一面。

《宋史》本纪记南宋的灭亡，写出了悲壮的一幕：

> （至元）十六年正月壬午，张弘范兵至崖山。庚午，李恒兵亦来会。（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卫王赵）昺其中。大军攻之，舰坚不动。又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二月……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这一段文字，是《宋史》本纪中少见的史笔，可谓有司马光之风。撰者最后评论说：“宋之亡徵，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在元的灭宋问题上，史官们终究还是打出了“历数有归”、“天命”所在的旗帜。他们还写道：“我皇元之平宋也，吴越之民，市不易

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讨论。”(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47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1976至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史稿》标点本,原先作为《时宪志》附录的“八线对数表”凡7卷,因其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不再附录,故全书为529卷。《清史稿》乃得以在更大的范围流传,所谓“供百世之讨论”,当然也就具备了更好的阅读条件。

注释与版本及考订与补作

关于二十六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因有久远的历史而积累了丰富的著作。其中,又因“前四史”历来负有盛名而成书又都较早,有关它们的研究著作,自东汉以下,无代不有。可以这样说:要了解关于二十四史研究的历史及其代表性著作,其困难的程度,恐怕要在阅读二十四史本文之上。这里,只就注释、版本、考订、补作等几个方面,举其荦荦大者略作说明。

一 注释与版本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都是有注本的,有的注本今已不存。其中,《汉书》注出现最早,注家也最多,历史上的“《汉书》学”,跟注释《汉书》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的兴盛,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史注,对后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史注的价值,至少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有助于读史,二是反映注家的学术旨趣,以至于反映注家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和认识水平。有的史注,甚至成为史书不可分割的部分。

"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称,东晋蔡谟作《汉书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果真如此,则至南朝陈朝时,已不止二十五家了。早于《史通》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注只有18家,蔡谟集解已不见著录,可见已有不少散佚。唐太宗贞观年间,颜师古(581—645)秉承"《汉书》学"的家学传统,在前人所作20余种《汉书》注的基础上,撰成《汉书注》120卷。颜师古的《汉书叙例》阐述了注解《汉书》的历史,说明了他注《汉书》的体例和要求,文末附录了注释诸家的名氏、爵里,是一篇关于史注的重要文献。颜师古的《汉书注》十分明确地注意到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旧注的处置:凡认为恰当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凡意有未伸者,"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凡"越理乱真"者,则"匡而矫之,以去惑蔽";凡"泛说"、"芜辞","徒为烦冗"者,一概不取;凡旧注阙漏者,则"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第二,是对"六艺"之文的态度:不"追驳前贤",也不"曲从后说",而"各依本文,敷畅厥指"。第三,对原书纪、传、表、志所记"时有不同"者,或"笔削未休,尚遗秕稗",或"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都"穷波讨源",予以甄释。颜师古给自己提出的这些目标和要求,足以说明他的严谨和博洽。《汉书》颜注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字音、字义的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坚深;二是不脱离原著,"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岐路",反对注家"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均见《汉书叙例》)。史载:《汉书注》出,"大显于时",时人称颜师古为"班孟坚忠臣"(《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汉书》颜注是当时以注音、注义为重点的这一注史流派的最高成就。颜师古注《汉书》的同时,或稍在其后,唐人为《汉书》作注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的,还有刘伯庄、敬播、姚珽、

讷言、格希元等参与注释，参考前人《后汉书》注，以及以《东观汉记》、《续汉书》为主的诸家东汉史和其他经、史、地理、小学之书，以注《后汉书》纪、传，征引广博，训释简明，为世人所重。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李贤等所注《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补的《后汉书》(实则《续汉书》)志由各自单行而合刻为一编，由此大致确定了《后汉书》注的面貌。北宋以下，注家甚少。然至清代，则有惠栋(1697—1758)作《后汉书补注》24卷于先，再有王先谦作《后汉书集解》120卷于后。《补注》是"补"李贤之"注"，多有进境；《集解》是合李、惠二注而复广征古说，以成"集解"，是为《后汉书》注的集大成者。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刘昭注史，重在采集同异即补充史事；李贤注史，重在训诂。二注相合，风格迥异。而惠栋《补注》，风格同于刘昭、异于李贤；王先谦再合之为《集解》，越发显示出注家旨趣上的差别，因而也就难免于庞杂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后汉书》，包含了范晔《后汉书》及李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及刘昭注，而对王先谦等人在注解和校订上成果也精心采摘，写入校勘记，以示不隐。

《三国志》的注，以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一举而成名家，流传千余年不曾受到动摇。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无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有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这是裴松之作注的宗旨和方法。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很丰富，而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和史事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册府元龟》等书所存佚文作补充而“复原”的，便是突出的一例。又如李延寿《南史》、《北史》行世后，流传之广超过“八书”，后者乃出现散佚、残缺的情况，其中以《魏书》、《北齐书》最为突出。北宋校刻时，《魏书》全阙26卷、史文不全者3卷；《北齐书》只剩下原文17卷，阙33卷。所缺部分，人们反以《北史》等书及唐人史钞、史目补缺、编次，用以“复原”。从这两个例子，可以大致看到二十六史中许多史书在流传过程中其抄本、刻本的复杂情况。而对每一部书的流传及其不同本子的了解、比较和研究，非专门之学不能尽其详，当非夸大之辞。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和《清史稿》标点本，在其“出版说明”中都有简明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大致说来，所谓“版本”问题，是北宋雕版印书盛行之后才产生的。宋人尊十七史，但宋刻十七史各种刊本因年代久远已不齐全，且残缺颇多，而幸存的都是极珍贵的善本了。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也刊刻了历代正史，各路所用版式并不一致，幸存者也是弥足珍贵的善本了。明代尊二十一史，且南北二京的国子监都有刻本行世，是为“南监本”、“北监本”二十一史，它们流传比较广泛。清皇朝在武英殿设置了刻印书籍的机构，乾隆年间“钦定”的二十四史即于武英殿刊印，是为“殿本”二十四史，代表了官方刻书的质量，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版本。清末，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5个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是清代第二个二十四史版本，称作“局本”。本世纪以来，又有两种有影响的二十四史版本问世。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一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精选历代善本配补、汇合而成，使读者得以一览诸家善本的风采，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宏伟工程，它集中了一大批学

们对二十六史的研究已不限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而是越来越重视从史学发展的历史上去研究它们、评论它们。对于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势必也将提到日程上来,这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当代史学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二十四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尊为"正史",地位之高,自不待言。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为那个时代所需要。

近代以来,人们对二十四史的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他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又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于是,《二十四史》是皇帝"家谱"、是"相斫书",一时成为很时髦的说法。可是,到了 20 年代,梁启超本人已不再坚持这种说法了。这种看法甚至也曾经影响过鲁迅,不过鲁迅很快就放弃了它。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中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17 页)可见,鲁迅对二十四史有一种辩证的认识。这种认识,着眼于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历史发展前途的估量。1935 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

书》、《南史》、《北史》等正史也都没有立志。

史表、史志既然重要,何以前代正史每每出现漏载现象呢?归根结底与以下两点有关。第一,认识不一。古代学者(其中包括著史家),对史表、史志的看法并不一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姑且以史表为例,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就十分反感。他认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谍,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甚至批评说"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所胜道哉"?班固以下,"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史通·表历》)。郑樵、章学诚诸名士则力诋此说。郑氏以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通志·总序》),章氏也竭力步郑樵后尘,甚至为《汉书》之《古今人表》辩白:"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文史通义·又与史余村》)第二,难度较大。正史之纪、传反映人物比较容易,而表、志以典章经制为主则相对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表、史志与本纪一样,都是正史之"纲"。尤其是写志,既要用言极简,又要学有专长,因而一般史家可以写纪或写传,却难以在史表中挥洒。诚如前人所说:"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其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郑樵《通志·总序》)这大概是那些缺表、缺志的史家们难以四体得兼的一大苦衷。

有如上述,史表、史志意义深远,功不可没。所以自南朝萧梁时期起,刘昭便为《后汉书》补入"八志",是为补充正史表、志首开先河。后世史家锲而不舍,不断增表、增志,用力最勤的当推清代诸学者。翻开4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可以

看到他们的累累硕果。正史中原有的史表、史志也好，历代学者所增所补者也好，都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应当努力地加以挖掘，使之更好地古为今用。

（《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2期）

由于编撰人员的认识不同，见解异趣，去取之间，畸轻畸重，于是遗漏一些，自是难免；加上传录刊刻而造成的脱漏，也屡见不鲜。所以根据史籍和类书，还有两项可以注意的工作：

一是增补事实，如《乙巳占》卷二记载："魏青龙二年(234)十月乙丑，月犯填星。"《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晋朝杂事》："武帝太康二年(281)九月，慧星见于东方。"《太平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书》："愍帝建兴三年(351)枉矢自文昌北流至斗东，如一匹布绛，蛇行有手足，因变为云气，如人象，二臂一足。"《建康实录》卷十二记载："(宋)元嘉五年(428)五月己巳太白经天。九月癸酉夜，有黑气如流星，出奎娄，没羽林。"《南齐书·天文志序》说："(宋)大明二年(458)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于斗。"像这一类星变，可以增补入《宋书·天文志》的为数还很多。

二是本书的逸文，如《开元占经》卷三十二引《宋书·天文志》："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六月乙亥，火犯牵牛中央星。"同书卷三十六引《宋书·天文志》："(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五月癸卯，荧惑顺行入太微。"均是《宋书》的逸文。又《太平御览》卷八七七引《宋书》："(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二月，夜有黑气五，东西经天、南行。"同书卷八七五引《宋书》："(宋)后废帝元徽五年(477)四月，星陨于东南，有声如雷。"这两条后面都有占星的文字，当也是出于《天文志》。此外，关于太阳黑子和日食等现象，有的史籍把它列入《五行志》，而不是放在《天文志》内，《汉书》、《续汉书》、《宋书》都是这样，其实应该移入《天文志》才更合理。

古代天文学，因限于科学水平，经常是和迷信夹杂在一起，预言祸福，以示灾祥，于是占星术在《天文志》中，便成了一方面的组成部分。其荒谬无稽，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天文学的发展史上，仍需加以注意。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也还有可以利用之处。

不仅有益于历史和天文的学习，也可以使我们祖国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第 3 期）

原来的第二曲向北弯曲了大约6里。到了成帝时，河势斜直贝丘县，威胁着贝丘县的大堤，百姓寒心。由此可见，到了西汉后期，黄河河床的状况已令人担忧。

自战国筑堤以后，河道虽被固定，由于泥沙不旁泄，河床淤积迅速，河堤也随之加高。某些河段又形成地上河。贾让亲自考察河道，见黎阳一带，“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循堤而上，“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可见两千年前黄河已经是地上河了。从上述记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汉末年的黄河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一次重大的决口、改徙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3. 河北平原海陆变迁的重大启示。《沟洫志》引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以往学者大多对王横的话表示怀疑。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确认这次海侵是曾经发生过的，时间大约在西汉中期，距王横时代不过百年左右。这是渤海湾地区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沟洫志》保留了王横的一段话，对解决这个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4. 提供了先秦黄河的不少信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黄河的情况，只有《山海经》、《禹贡》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黄河的流经。而《沟洫志》却是后人研究先秦时期黄河的主要根据。第一，后人一直奉为圭臬的禹导九河，《尔雅》只举了水名，究竟流经河北平原哪些地方，单凭《禹贡》导河的几十个字，实难以捉摸。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一段话，则颇有启发，他说：“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不离此域。”《汉书·地理志》勃海郡成平县（今河北交河县东北）境内有“滹池河民曰徒骇河”，可见

成平县一带的汉滹池河，原是《禹贡》的徒骇河，亦即《禹贡》九河中的干流。因此将《沟洫志》和《地理志》两者结合起来，禹导下游九河的大致地域是可以知道了。第二，堤防是河流发育、变化的重要标志。筑堤前后河流变迁的特性有很大差异。上古时期沿黄居民为自保而修筑小规模的堤埝必定很早，且已无法考究。但黄河下游全面筑堤究竟起于何时，《汉书》以前没有明确记载。《沟洫志》引贾让所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的说法，经后人考证是可信的。这使我们对先秦时期黄河变迁分期有一个明确的标志。第三，上古时期黄河下游未筑堤防，改徙无定。但在《汉书》以前不见任何记载，《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引《周谱》云"周定王五年河徙"，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是春秋时的周定王，还是战国时的后定王，也知道这不过秦汉以前黄河多次改徙中的一次。但毕竟保留了我国历史上早期一次河徙的文献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总之，今天我们对西汉时期黄河的特性、变迁的趋势、河道的状况、河患的影响都比较清楚，就因存有《沟洫志》。故就黄河问题而言，《沟洫志》在保存资料方面胜于《河渠书》。

至于班固不依史迁而名"沟洫"的是非，今人吴宗慈在《修志丛论》(1947 年成书)中《论水道列目》有评论，其云："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地理有定，而水道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别沟洫于地理也。顾河是天设，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工人险之义，而固之命沟洫，则《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于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当于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三、《宋史·河渠志》。共 7 卷，为诸河渠志中篇幅最广、规模

最大的一部。其特点：

1. 内容面广，就地域言，西至关中，东抵海，北达宋辽边界塘泊，南至广西灵渠，几包括宋代全部境域。就时间而言，自五代显德至南宋宝祐年间，包括整个北南宋。内容可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黄河。对黄河河源作实地的考察，实始于元代，是当时最新的考察成果，故《河渠志》以此列于卷首。下游河道自唐末以来，决溢日益严重。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人为扒开河堤，以水代兵的事时有发生，河堤破残不堪，又未及时修复，故宋初乾德年间即有较大规模河患的发生。宋代建都开封，地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受河患的威胁最大，而宋一代河患又特多，故《河渠志》中记黄河特详，基本上包括了宋一代黄河所发生的主要事迹。故七卷中占有二卷半。第二部分是汴河。北宋定都开封主要取其水陆交通之便。《宋史・食货志》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黄河主要输送西北柴薪，对开封关系最大的是所谓"东都三带"（范镇《东斋记事》），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开宝六年改名广济河），再加上作为广济河水源和城内给水的金水河，合为宋代京都的漕运四渠。其中汴河每年输送600万石，为太仓蓄积，惠民、广济各不过60万石。汴河是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正如张方平所言："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同言也。"（《乐全集》卷二七《论汴河利害事》）。汴河分上下，各占半卷，合一卷，与黄河合占三卷半，几占全志二分之一。第三部分则是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诸水，如蔡河（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白沟河和京畿沟洫等。开封城内众水交汇，地下水位很高，每逢暴雨，城内积水难排，所谓"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这部分即有关京城的交通和城市、宫廷给水排水的大事。第四部分是河北平原上的水

冰到盛夏方消,"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芦苇开花,谓之荻苗水。九月谓之登高水。十月水流复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水流结冰,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对了解黄河水情,预防黄河洪水有重要意义。对黄河水流运动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水平。如认识水势顶冲堤岸,使大堤坍塌,谓之劄岸。洪水漫过堤顶,谓之抹岸。堤坝腐朽,底部被水淘空,谓之塌岸。水漩浪急,堤岸崩坏,谓之沦卷。河弯处受水势顶冲,回溜逆水上壅,谓之上展。顺直河岸受水顶冲,波涛顺流下注,谓之下展……。对黄河泥沙与洪水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其云"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对堵塞决河的物料都有规定,有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等,制成埽岸,下於河堤薄弱处,以护堤岸;决口时即以此堵口。埽岸又根据水势有马头、锯牙、木岸之别。东南海塘较成规模,始于北宋。故本志专列浙江条述及海塘。其他如灌溉、航运、防洪、防潮、城市给水等工程技术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实为科技史的重要资料。

3.《宋史·河渠志》之所以修得较好,实受益于资料来源丰富。据笔者查考,《河渠志》主要根据《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文集、奏章、宋代方志等资料辑录编纂而成。有关水利事业的史实很少遗漏。以黄河为例,以《河渠志》与《宋会要》、《续通鉴长编》核对,河道决溢改徙主要事实均无遗漏。对宋人文集的采录大多辑录原文,如黄河篇记苏辙语,即辑录《栾城集》卷四六《论黄河东流札子》;汴河篇引熙宁五年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即辑录《乐全集》卷二七《论汴河利害事》;西湖篇中苏轼所云,即《东坡奏议》卷七《乞开杭州西湖状》。宋代东南地区方志发达,

始建年代，是较为宝贵的史料。滹沱河篇仅 108 字，漳河篇仅 101 字，皆随便抄录几条治理工程的记录，全无章法，实为河渠志中较差一部。宋、金二史同出于一批作者之手，为何优劣相差如此？盖由于金代保存的有关水利的原始资料就缺残不齐，修志者只能据所见资料拼凑而成。

五、《元史·河渠志》。3 卷。是诸河渠志中最差的一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条："元史纂修始於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告成，计一八八天。其后续修顺帝一朝，始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局，七月丁未书成，计一四三日，综前后仅三三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可见《元史》成书仓促，未经精心编撰。就《河渠志》而言，显然是出于众人之手，编者既不谙水利，资料又来源不一，只是随手抄录，未经排比、剪裁，最后总纂又未加以统一整理，故讹舛脱误之处甚多，为后人所诟。然就水利史角度而言，也保留了一些宝贵史料，不可不提。今分别言之。

1. 编排不当。《元史·河渠志》一反《宋志》体例，不以黄河为篇首，而以大都附近诸水为篇首，这未尚不可，然其编排大为失当。如卷一以通惠河为首，依次为坝河、金水河、隆福寺前河、海子岸（什刹海）、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瓮山、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兖州闸等十七条，均为中书省境内的河道。其中卢沟河和浑河实为一条河流，志文却分成二条，中间隔一条白浮瓮山。显然编者不知卢沟河、浑河为一条河流，而是将收集的材料，随手编排，至有此误。白浮瓮山（泉）条云"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通惠河条云"其源出於白浮瓮山诸泉水也"。则白浮瓮山应列于通惠河前后，而编者列于卢沟河、浑河之间，殊为失当。兖州闸为会通河诸闸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水闸，

控制着泗水的流量，无疑应列入会通河内，然志文却专列一条，于卷末，首云“兖州闸已见上”，而在会通河条内兖州闸只列一名，无与其他各闸皆有的方位里距和置闸年代。其草率竟有如此者。总之前后混杂，全无章法。

2. 内容误植，叙述混乱。卷二首列黄河，时间从至元七年至至顺元年，然卷三又有黄河，转录欧阳玄《至正河防记》全文，两部分首尾不相应，显然是第二次修《元史》时随手抄录而未加整理。卷二黄河后为“济州河”条，首句“济州河者，新开通漕运也”。其下所记均为山东胶莱运河事，与条目“济州河”风牛马不相及。济州河为会通河之南段，此条应列于卷一会通河之前后。其他讹舛衍脱之处，不一而足，无法备举。今以卷一通惠河条所记沿河各闸位置为例，以窥豹之一斑。志文云：“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外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闸一里；藉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的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在这不足200字的记载里，错误有6处之多。依次为：①“广源闸”下有脱文，据《元一统志》应为“广源闸：在护国仁王寺西”。②“海子闸”下有脱文，据《元一统志》“闸”下脱“三”字。③“郊亭闸二”，据《元一统志》此处“二”当为“三”之误。④据《元一统志》，“通州闸”与“杨尹闸“之间脱“河门闸二”。⑤志文误将“朝宗闸”列于末尾，据《析津志》“朝宗闸”应在“西城闸”与“海子闸”之间。⑥志文误将“杨尹闸”置于末二，据《析津志》应在“郊亭闸”与“通州闸”之间。其他类此者不乏其例。

则列于《河渠志·运河下》,这是首创。明代前期海运发达,主要是分流一部分漕粮走海路运往天津卫。其职能与运河相同,故附于运河后。万历以后倭寇事起,海运才衰落。③淮河原是中原地区一条大河,但在《明志》以前从未列有专条。这是因为明代以前淮河从未为患。明代开始黄河长期夺淮。淮阴以下黄淮合一,黄淮同时涨水,下游宣泄不及,便东决危及里下河地区,黄强淮弱,淮水不能下泄,便倒灌凤阳、泗州间。万恭说:"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扬。"直至今日,治理淮河仍是豫、鲁、皖、苏4省消除水患的重要任务。仿《元史·河渠志》将淮河列专条。④沁河是黄河中下游交接点处的一条支流,在武陟县入河。明以前未闻有患,故明前诸志从未将沁河列有专条。宋元以后,由于太行山区植被的严重破坏,沁河含沙量很高,且与黄河一样具有流量不均的特点。伏秋季节,黄沁并涨,沁不敌黄,往往在武陟县境内东决为患。元时郭守敬曾引一部分沁水东北入卫,一为减轻黄河的负担,一为补充卫河的水源。明时仍有引沁入卫之议。"但卫小沁大,则其势难容;卫清沁浊,则末流必淤"。且地形沁高卫低,卫辉府城内,"浮图最高才与沁水平"。"况沁水猛涨,势比黄河,稍有一线之决,溢入卫河,则临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河防一览》卷十四《查理沁卫二河疏》)。所以明代有一部人反对引沁入卫。但黄沁并涨是黄河下游一大隐患,引沁入卫问题成为明代治河策略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故《明志》专列一节。⑤泇河和胶莱河是明代争论最大的两条河流。隆庆四年(1570)黄河决入邳州,自睢宁至宿迁一百八十里黄河淤浅。总河侍郎翁大立提出开泇河以避黄河,未决而罢。以后多次争议,工程时停时续,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始成,自创议至功成,前后达34年之久。为明代后期治运史上一件大事。元至元十七年(1280)就有人提出开凿沟通山东

此,反倒把我国第一部最古的目录大致保存下来。……班固有丰富的史学和目录学知识,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才能认识各种目录工作的重要,而能够在正史里特辟一艺文志。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所独有的一种目录。"①

但是,向歆的《录》、《略》,除"九流以别"还"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删去了《七略》中的辑录。"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七略》中各书简明叙录,必要时节取改为班固的自注,对原来文字做了一些修补。在分类著录方面,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②。

后世对《汉书·艺文志》多有赞誉,清人金榜甚至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其实,班志在分类与著录方面只起了一个保存《录》、《略》的作用,少有创新之意。其主要功绩还在于开创了史志目录,在学术界创立了修历史要包括图书目录。

继《汉书》以后,第二部正史艺文志为《隋书·经籍志》。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说:"……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迁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

① 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② 北大、武大:《目录学概论》。

二

我国纪传体正史中有艺文(经籍)志者“不及三一,后人以史志而阙艺文,则一代文献将无所徵,于是有补志之举。更有因史志虽具艺文,但阙漏颇多,而为之补苴增益者,此风启于清初而盛于乾嘉,抵今犹未已”①。所以“补史艺文志”有两种,一种为原来的正史无艺文志而补做的,如《补宋书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一种为原有正史艺文志,但不完整而补志者,如《补后汉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遗》。

对于补正史艺文志的兴起,现代目录学家王重民说:“……清政府开明史馆,纂修明代的正史。对于明史艺文志的作法有两种意见:一派主张宋史艺文志既然没有包括宋宁宗以后的著述,元史又没有艺文志,所以应该包括宋末到明末的著作;另一派主张干脆以明为断代。分担纂修明史艺文志的是黄虞稷,他是按前一派的主张开始工作的……但到了王鸿绪重修《明史稿》,采取了后一派的主张,把宋辽金元四朝著作都删去。”到《明志》刊行以后,许多人认为不满意“逐渐产生了把黄虞稷所补宋辽金元四朝艺文提出刊行的意见。……补正史艺文志的工作从此开始了”②。

由于正史艺文志从《宋史》至《明史》中间时间既不衔接,体例又从记一代藏书改为记一朝著述,中间宋后期及辽、金、元各朝藏书或著述都无史志目录,所以“补”这一时期的目录最多,其中重要的为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

① 聂崇岐:《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

② 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从目录学看没有多大成就，但重要的是起到记录我国藏书和著述的目的，是不可或缺的。

（《河南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2期）

的国家目录的编制提供充分的依据。补史志目录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图书馆》1983年第3期）

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

——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

陆人骥

我国一向以农立国。历代广大农民为了获得农作物的丰收，终年辛勤地劳动着。但是除了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外，还往往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摧残和破坏，甚至颗粒无收，形成饿殍载道的悲惨境地。这在旧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这许多自然灾害中，蝗灾也是其中之一。它的出现更使人触目痛心，因为眼见作物已经成长和成熟，正当丰收在望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大群蝗虫，却把一大片、一大片的农作物掠食一空。正如明代宋应星所说的："江北蝗生，则大祲之年也。"①从而在历代史书中常有记载的。早在《春秋》一书中，就已有"鲁宣公十有五年……初税亩。冬，蝝生。饥"的记述②。如果根据董仲舒"蝝即蝗子"的说法③，那么在公元前 592 年，就曾发生过一次蝗灾，这可说是蝗灾

---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麦灾中语。

②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 册，第 814 页及第 615 页注⑧："刘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并见王充《论衡 · 商虫篇》："鲁宣公履亩税，应时而有缘生者，或云若蝗，时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择谷草。……"

③ 王充：《论衡 · 商虫》篇。

志第二十六·五行志）

3. 光启元年(885)秋，蝗自东南来，群飞蔽天。(《新唐书》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五行志）

4. 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弥覆郊野……(《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下）

5. 宝元四年(1041)淮南旱、蝗。京师飞蝗蔽天。(《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6. 崇宁三四年(1104、1105)连岁大蝗，其飞蔽日，来自山东及府界，河北尤甚。(《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7.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江东、淮南北郡县蝗。飞入湖州境，声如风雨，自癸巳至于七月丙申，遍于畿县。……(《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8. 隆兴元年(1163)……八月壬申、癸酉，飞蝗过都蔽天日。(《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9. 开禧三年(1207)夏秋久旱，大蝗，群飞蔽天，浙西豆粟皆既于蝗。(《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10. 嘉定二年(1209)浙西诸县大蝗。自丹阳入武进，若烟雾蔽天，其堕亘十余里，常之三县捕八千余，石湖之长兴捕数百石。浙东近郡亦蝗。(《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11. 元至正十九年(1359)……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新元史》志第十二·五行志下）

12. 明建文四年(1402)夏，京师飞蝗蔽天，旬余不息。(《明史》卷二十八·五行一水蝗蝻）

13. 宣德九年(1434)七月，两畿、山西、山东、河南蝗蝻覆地尺许，伤稼。(《明史》卷二十八·五行一水蝗蝻）

京东蝗生,食苗叶。八月,开封府祥符、咸平、中牟、陈留、雍立、封立六县蝗。(《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下)

3. 元大德二年(1298)二月,归德等处蝗。四月,江南、山东、两淮、江浙、燕南属县百五十处蝗。六月,山东、河南、燕南山北五十处,辽东大宁路金源县蝗。(《新元史》志第十二·五行志下)

后者如:

1. 北魏高祖太和五年(481)七月,敦煌县蝗,秋稼略尽。六年(482)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蝗害稼。七年(483)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八年(484),济光幽肆雍齐平七州蝗。(《魏书》卷一百一十二上·志第十七·灵徵八上)

2. 唐贞观二年(628)六月,京畿旱蝗。三年(629)五月,徐州蝗。秋,德戴廓等州蝗。四年(630)秋,观兖辽等州蝗。(《新唐书》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五行志)

3. 开成元年(836)夏,镇州河中蝗害稼。二年(837)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838)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新唐书》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五行志)

4. 宋建隆元年(960)七月,澶州蝗。二年(961)五月,范县蝗。三年(962)七月,深州蝗虫生。四年(963)六月,澶濮曹绛等州有蝗。七月,怀州蝗生。(《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下)

5. 元丰四年(1081)六月,河北蝗。秋,开封府界蝗。五年(1082)夏,又蝗。六年(1083)夏,又蝗。(《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水)

6. 明洪武7年(1372)六月,济南属县及青莱二州蝗。七月,徐州大同蝗。六年(1373)七月,北平河南山西山东蝗。七年(1374)二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蝗。六月,怀庆真定保定

（以上均见《明史》卷二十八·五行一水蝗蝻）

再从蝗灾发生的时间来看，除记载中阙如外，有的记载着为季节，有的记载着为月份（农历）。它们各自的统计如下：

表 2　历代蝗灾发生的季节统计表

季　节	春	夏	秋	冬
次　数	——	35	23	——

表 3　历代蝗灾发生的月份统计表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闰六月	闰七月
次数	—	4	8	28	38	76	61	28	8	3	1	5	1	1

可见基本上是与气温有关。

关于蝗灾发生及其波及的地区，那么除极少数年份发生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外①，确实以长江以北地区为常见。这正如篇首所引述的宋应星所说的："江北蝗生，则大祲之年也。"

---

① 例如，1. 东晋大兴三年（318），五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郡百姓多饿死。（《晋书》卷二十九·志第九·五行下）

2. 宋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仁和县蝗。

3. 开禧三年（1207）夏秋久旱，大蝗，群飞蔽天，浙西豆粟皆既于蝗。

4. 嘉定元年（1208）五月，浙江大蝗。

5. 嘉定二年（1209）浙西诸县大蝗自丹阳入武进……时浙东近郡亦蝗。

6. 嘉定三年（1210）临安府蝗。

7. 嘉定七年（1214）六月，浙郡蝗。

8. 嘉定九年（1216）五月，浙东蝗。

9. 绍定三年（1230）福建蝗。

10. 景定三年（1262）两浙蝗。

说法，于是在防治蝗灾的方法，就有设祭、祷祈等迷信行动的出现。但又正如《旧唐书》中所说的："开成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卷三十七·志第十七·五行）至于历代在防治蝗灾的有效方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主要的经验是：

一、发动灾民大力捕蝗灭蝗，有时还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例如：唐"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谍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岂无德致然？今坐为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饿谨（开明版原文如此，当作馑字。）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对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之以成灾。'帝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杀虫致祸，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宗道、高昌、贾彦璿等，宜令待虫尽而刈禾，将毕即入京奏事。谏议大夫韩思复上言曰：伏闻河北蝗虫顷日益炽，经历之处，苗稼都尽，臣望陛下省咎责躬，发使宣慰，捐不急之务，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诚，以答休咎，前后捕蝗使，望并停止。上出符疏付中书姚崇，乃令思复往山东检视虫灾之所及，还具以闻"（《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五行，开明版《二十五史》第 3905 页）。又如宋："嘉定二年……常之三县捕八千余，石湖之长兴捕数百石。……""嘉定八年四月，飞蝗越淮而南，江淮郡蝗食禾苗山林草木皆尽。乙卯，飞蝗入畿县……自夏徂秋，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计。饥民竞捕，官出粟易之"。"嘉定九年五月，两浙蝗……是岁荐饥，

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开明版《二十五史》第4633页）。

此外，还挖掘蝗虫的卵和卵块。蝗虫的生长，是由卵或卵块成为成虫的，因而挖掘卵或卵块，也是防治蝗灾的一法，这在历代对付蝗灾中，也曾用过的。例如：宋“景祐元年六月，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种万余石”（开明版《二十五史》第4633页）。

二、利用鸟类以捕杀飞蝗。例如唐“开元二十五年，贝州蝗食苗，有白鸟数万，群飞食蝗，一夕而尽”（新、旧《唐书》同，开明版《二十五史》第3905、3717、3718页）。又如五代“乾祐元年七月……开封府奏，阳武雍邱襄邑等县蝗……寻为鸜鹆食之皆尽。敕禁罗弋鸜鹆，以其有吞蝗之异也”（《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志第三·五行志）。元“至治二年汴梁祥符县蝗，有群鹜食蝗。既食而复吐之，积如丘垤高”。后“至元三年七月，武陡县鹰食蝗”（开明版《二十五史》第6711页）。

此外，也因偶遇大风大雨而蝗死的。

至于主要的教训，就是除恶务尽，否则留下隐患，必将重生蝗灾。例如：“东汉永初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蝗处复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国四十八蝗。”（《后汉书》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三）又如：宋开禧元年“开封府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两浙荆湖三十州军，蝗蝻复生，多去岁蛰者。和州蝗生卵，如稻粒而细。”“淳熙十年六月，蝗遗种于淮浙，害稼”（开明版《二十五史》第4633页）。此外就是只知祭酺，不加防治而使蝗灾复起。如宋“嘉定元年五月，浙江大蝗。六月乙酉有事于圜丘方泽，且祭酺，七月又酺，颁酺式于郡县”。可是到了嘉定二年四月，又蝗。

由于资料搜集还少，因而只能根据开明书店铸版《二十五史》

中的一些记载，作初步研究如上。抛砖引玉，作为大力开展灾害学的参考。并请不吝指教。

(《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共40小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以后各书的“二志”都沿用了这种分类法，所不同的是各志在具体分小类时又做了不同的归纳、调整。例如《明史·艺文志》只分了35小类，虽然分类简略了，可有些类合并得也不尽合理。例如把医书附在艺术类后，使医药书与琴、棋、书、画书籍同在一个类目中，不如《隋书·经籍志》把医药归在子部单列一类好。《清史稿·艺文志》分了45个小类，在每小类下面又更细地分为属，分类越来越细，是为了适应当时图书增多的需要。

（二）“二志”中包含科技书目的类属

《汉书·艺文志》的术数略和方技略主要反映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述，天文、历法、数学、医学著作就著录在这两略中。《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采用四分法的史志书目，经部著录儒家经传和小学方面的书；史部著录历史书和地理方面的书；子部著录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包括哲学、政治、科技和艺术等类书，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书目就著录在这一部分之中。集部著录了诗、词、文、赋方面的书目。

因此，“二志”中能够明确辨别出是科技书目的类别有：《汉书·艺文志》的术数略中的天文类和历谱类；方技略中的医经类和经方类；诸子略中的农家类。《隋书·经籍志》及其他几志子部的天文类、历算类（《清史稿·艺文志》称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和算书之属），医方类（《新唐书》和《旧唐书》称明堂经脉和医术本草），农家类，《清史稿·艺文志》的谱录类中的植物动物之属；还有史部地理类。

（三）其他类中夹杂的科技图书

除上述各类中著录了一批相关科技书目外，有些类中也夹杂着科技书目。例如《汉书·艺文志》术数略的形法类中著录了地

表2　各类科技书目数量占各志著录总书目百分比　　单位:%

书名	数量	天文 历法	数学	医药	农业	地理	合计
汉书	596部	6.3	0.3	3.0	1.5		11.1
隋书	6 520部	2.7	0.5	3.9	0.8	2.1	10.0
旧唐书	3 061部	1.9	0.7	4.4	0.6	2.8	10.4
新唐书	5 218部	1.9	0.7	4.6	0.7	3.1	11.0
宋史	9 819部	2.6	0.5	5.2	1.1	4.1	13.5
明史	4 653部	1.6	0.2	1.5	0.5	10.1	13.9
清史稿	9 653部	1.4	2.5	2.6	1.0	8.5	16.0

四　分析与结论

依据表1的数据,将“二志”所著录的同类书目放在一起,以书的部数(《汉书》以家数为单位)为单位,可以画出“二志”著录科技书目的比较图,见图1。如果考虑“二志”中各类科技书目数在各志所录总书目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可列出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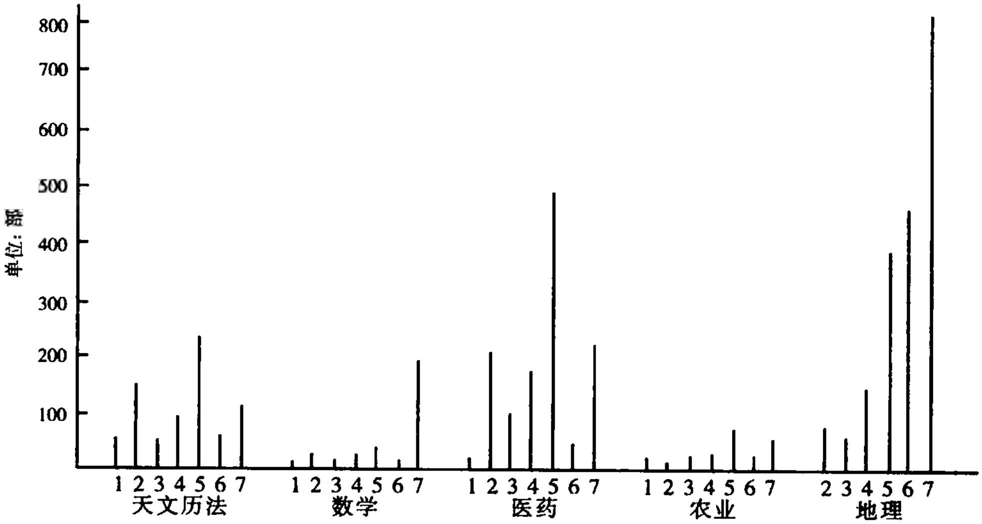

图1　“二志”著录科技书目数量的分类比较图

1《汉书》　2《隋书》　3《旧唐书》　4《新唐书》　5《宋史》　6《明史》　7《清史稿》

堪压迫,乃爆发了三次大规模反抗起义,最后被汉王朝镇压等一系列史实都有较详细的记述。

2. 汉代小月氏史料。小月氏是月氏的一部分。西汉初年遭匈奴攻击,迫使月氏大部分远徙中亚细亚,羸弱部众迁徙到祁连山一带,与当地羌人杂居相处。小月氏的活动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有零星记载,在《后汉书》之《西羌传》中更专门列有"湟中月氏胡"一小节,短短数百字,记载了小月氏的历史活动。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语言跟当地羌人略同,西汉初年归附,以求生存,青壮年被护羌校尉选作义从,至东汉末年首领率义从起义,反抗东汉王朝,前后约达400年。

3. 隋唐五代时期的党项羌史料。《隋书》卷八三《西域·党项传》、《北史》卷九六《党项传》、《旧唐书》卷一八九《西戎·党项传》、《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党项传》、《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党项传》、《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党项传》等6个传,主要记载了党项羌在建立西夏政权前的活动历史。党项系古代羌族的一个分支,南北朝时期分布在青海东南河曲中心地区和四川松潘以西一带。唐初因受吐蕃侵逼相继内迁,由河曲、河陇到达今陕甘宁地区。未迁走的党项仍留在原生活地,被吐蕃所统辖,称作"弭药"。党项诸传中无一例外地记述了党项羌原世居的地望、生活习俗、服饰装扮、军事组织、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等内容,其中《隋书》和《北史》的文字略同,记载党项羌从北周至隋初的活动;两《唐书》记载党项羌在唐代的活动,有8个互不相统的氏族部落及黑党项、雪山党项的活动,拓跋氏部落崛坦,势力强盛;两五代史记载了党项羌在后周、后唐时期的情况。

4. 明代藏族、蒙古族史料。《元史》和《新元史》对青海藏族没有记载。《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集中记载了有明一代

绘传》、《魏书》卷四四《乙环传》、《北史》卷二五《乙环传》记载了世居今青海湖地区的鲜卑乙弗部首领匹知之子乙环入贡北魏，并留居洛阳，其子孙三代皆仕北魏为官，终成洛阳显赫门宦的史实。乙弗部于西晋末年迁徙至今青海湖一带定居，曾建立部落政权，首领世称青海王，故史书称之为乙弗勿敌国。入附北魏后，长期生活在内地，籍贯称河南洛阳人。乙环娶太武帝女上谷公主，封镇南将军、驸马都尉。子乾归袭爵，娶景穆帝女安乐公主，封中道都将、驸马都尉。乾归子乙弗海官侍御中散、散骑侍郎。海子乙弗瑗娶孝文帝女淮阳公主，封中军将军、驸马都尉。瑗女由西魏文帝纳为妃，又册封为皇后。因遭悼后妒忌，被迫自尽。乙弗皇后兄乙弗绘入仕西魏，官至吏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

2. 宋元明清时期。《宋史》卷四五三《忠义·高永年传》记载蕃官高永年在崇宁二年(1103)随宋军进攻河湟地区，任西宁州知事，后被招纳的吐蕃亲兵杀死。

《金史》卷九一《结什角传》记载河湟吐蕃拥立唃厮啰五世孙结什角为王，建立地方小政权，向金称臣纳贡，被西夏人围攻而死。这个政权直到蒙古军队占领河湟才告终结。

《辽史》卷一〇八《直鲁古传》记载吐谷浑人直鲁古出生世代行医之家，战乱中为父所弃，被辽太祖、淳钦皇后收养，成年后擅长针灸医疗，辽太宗时官居太医给侍。

《元史》卷一三四《刘容传》、《新元史》卷一五六《刘容传》内容相同，记载刘容受到元世祖赏识，由中书省属员出任广平路总管，耿直清廉，卒于任职。

《明史》卷一五六《李英传》记载西宁土官李英、义子李文在明初击西番、抗蒙古，立有靖烽火安边疆的功劳，受朝廷奖赏。李英封会宁伯，成为青海东李土司始祖，李文封高阳伯，成为青海西

(一)中国与南亚国家政府间的交往

中国与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和平相处,相互交往史不绝书。

按二十四史记载,中国与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国家间的交往最早见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张骞曾遣副使到身毒国(《史记》卷一二三)、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期以南地方),“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书》卷二八下),并于平帝元始二年(2)送来犀牛(《汉书》卷一二)。此后,不管两国内部政权有何更迭,两国的交往从未中断。东汉和帝时(89—105),天竺“数遣使贡献”(《后汉书》卷八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虽处于分裂状态,天竺仍与南北方的各个政权有来往。前秦时,天竺给苻坚(357—384)送来火浣布(《晋书》卷一一三)。北魏统一北方时(439—534),西天竺、南天竺几次遣使来并送礼物(《魏书》卷七、八)。在南方,天竺迦毗黎月爱国王于宋元嘉五年(428)给文帝送来国书及礼物(《宋书》卷九七);中天竺、北天竺皆遣使来梁(502—557)(《梁书》卷二);中天竺国王屈多还在天监初年(502年后)送来国书(《梁书》卷五四)。此后,天竺又遣使到陈(557—589)(《陈书》卷五)。隋统一中国后,炀帝(605—618)曾遣使去王舍城,得佛经而还(《隋书》卷八三)。

唐朝(618—907)与天竺的关系非常密切。高宗(650—683)、武后时(684—704),五天竺并遣使来唐(《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旧唐书》卷六);五天竺下属小国,如加没路国、摩揭它国、那揭国也遣使来唐(《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宗曾派王玄策到摩揭它国的摩诃菩提祠立碑(《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德宗(780—804)给那烂陀祠制钟铭(《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玄宗(712—735)给予南天竺军队怀得军名号(《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在唐与天竺的交往中,值得提出

的一件大事是玄奘留学天竺，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召见了他，后来该国国王又两次遣使来唐，唐太宗(627—649)送书去慰问(《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太宗、高宗时几次派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写了《中天竺行记》一书(《旧唐书》卷四六)，可惜今天已经失传了。

宋与天竺有很深的关系，与注辇国也有密切联系。北宋初(960年后)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啰曾来中国(《宋史》卷三、四九〇)。太平兴国七年(982)益州僧人自天竺带回其王没徙曩给宋廷的国书。雍熙中(984—987)卫州僧人辞瀚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一起送来北印度王及金刚座王那烂给宋朝的国书(《宋史》卷四九〇)。注辇是9至13世纪南印度半岛上的大国，真宗时(998—1022)，其国王罗茶罗乍送来国书及礼物。此后，仁宗(1023—1063)、神宗(1068—1085)时期，该国国王更不断遣使并送来礼物(《宋史》卷四八九)。

元与南印度东面的马八儿、西南角的俱兰来往非常频繁。元世祖(1260—1294)先后派唆都、杨廷壁、亦黑迷失等人出使马八儿、俱兰国(《元史》卷一三一、二一〇)，还专程派人去马八儿求奇宝及方技(《元史》卷十三、十六)。世祖一代，马八儿、俱兰不断遣使来中国(《元史》卷八、十、十二至十六)。仁宗时(1312—1320)，马八儿国王昔剌木丁派人专程送来礼物(《元史》卷二五)。

明与南印度沿海小国的关系也很好。太祖初年(1368年后)与东海岸的西洋琐里、琐里互遣使臣(《明史》卷二、三二五)。成祖(1403—1424)、宣宗(1426—1435)、英宗(1436—1449)时期，与西海岸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今科钦)、小葛兰(今奎隆)以及南面的甘巴里(今科摩林角)等国相互不断遣使送礼物(《明史》卷六、九、十、三二六)。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还提出，西洋

梨的国书(《梁书》卷五四)。唐高宗、玄宗时也遣使送来礼物(《新唐书》二二一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师子国与辽的关系。圣宗统和七年(989)师子国送来礼物(《辽史》卷一二),辽还设师子国王府专供师子国人享用(《辽史》卷四六)。元世祖曾派人持金十万去师子国购药(《元史》卷八)。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几经锡兰山,宣宗、英宗时两国使臣也互有往来(《明史》卷三二六)。

中国与屹立在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也有深厚的友谊。明时称它为溜山,郑和两次出使其国,永乐十四年(1416)后,其国王多次遣使并送礼物来中国(《明史》卷三二六)。

(二)商业贸易的联系

按二十四史的记载,中国与南亚的商业贸易联系可以追溯到汉武帝以前。两千多年来,通过陆上和海上进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日臻繁荣,愈到后来,海上贸易比陆上贸易就愈发达。

汉与身毒的陆上贸易已有一定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古代西域包括范围很广,我国新疆以西、中央亚细亚一带通称西域),在大夏见到蜀布邛杖,经了解是从身毒国去的(《史记》卷一一六),这说明汉代西南与身毒已有贸易往来。此时,西边通过西域道与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很活跃,《汉书·西域传》罽宾(今克什米尔)条记载着杜钦关于汉与罽宾关系的叙说,其中提到罽宾来的"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又提到汉去的"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可见这一带地方的交易兴旺。以致后来汉对罽宾是"赏赐贾市"。东汉时,西域道上的贸易已很发达,"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卷八八)。当时,东汉有很多"西域贾胡",这些"西域贾胡"当然包括天竺商人在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道上的贸易仍很频繁,史书虽

书》卷三三)。天竺僧俱摩罗所传的断日蚀法”(《旧唐书》卷三四),瞿昙罗造的“光宅历”(《旧唐书》卷三二《新唐书》卷二六)以及瞿昙悉达翻译过来的“九执历”。但唐人对天竺的历法有自己的见解,这在《新唐书》卷二七下,《旧五代史》卷一四〇及《明史·历志》中均有记载。

天竺数学研究成果也曾传入我国,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中还有从西天竺传来的“都利聿斯经二卷、聿斯四门经一卷”,《宋史·艺文志》中也见到“都利聿斯诀一卷、聿斯隐经一卷、聿斯妙利要旨一卷”等。

中国虽有伟大的医药宝库,但自古就不断吸收外来养分以丰富自己的宝藏。北魏灭佛时,有罽宾沙门师贤曾“假为医术还俗”(《魏书》卷一一四)。《隋书·经籍志》中保存了从天竺传入的“龙树菩萨药方”等12种。唐时,有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飙门造延年药,药成后太宗服用(《旧唐书》卷三);高宗时,东天竺僧人卢伽阿逸多以“术进”,帝请其造长年药,后被封为怀化大将军(《旧唐书》卷八四、《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玄宗时,北天竺沙门僧密多送来质汗等药(《旧唐书》卷一九八)。《宋史·艺文志》中还见到“耆婆脉经、耆婆六十四问、耆婆要用方、波驼波利译吞字贴肿方、婆罗门僧服仙茅方”等天竺药方以及“耆婆五藏论”、“龙树眼论”等。辽时,回鹘曾送来梵僧名医(《辽史》卷一二)。元时,马八儿曾送来名药,后来亦里迷失出使其国又得“良医善药”(《元史》卷一三一)。中国的医药也不断传入南亚,《明史·外国传》榜葛剌条记叙“有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关于生产技术的交流,二十四史中提供了许多待进一步考证

条枝。北有奄蔡、黎轩”①。条枝指今伊拉克、波斯湾一带，奄蔡在今威海至里海一带。关于黎轩，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②。但一般倾向于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黎轩”就是 Alexandria 的译音③。《史记·大宛列传》不仅记载了黎轩的地理位置（虽然比较模糊，将安息之“西”误为安息之“北”），还介绍了黎轩与汉朝的交往情况。其中说：“自博望侯骞死后……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这可以说是中国派遣使节到埃及去的最早纪录。其中还说：“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里说的“远者”，显然包括黎轩在内；汉使一个来回，需要八九年之久。由于记载过于简略，这些遣使的经过和结果，不得而知。据《史记》所载，张骞到乌孙后，曾遣副使到安息。《大宛列传》写道：“初，汉使至安息……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这位“黎轩善眩人”是随着安息的使团来到汉朝的；他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却是有史可考的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埃及杂技演员或魔术师。

班固在《汉书·张骞传》中也记载了上述史实，只是将“黎轩”写作“犛靬”，将“黎轩善眩人”写作“犛靬眩人”。《汉书·西域传》中又写作“黎靬”、“黎靬眩人”。按“犛靬”、“黎靬”，均与

① 本文所引二十四史，均据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

③ 参见孙毓棠、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 1957 年版。冯承钧《犁靬考》，见《景教碑考》附录，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黎轩"读音相同,皆指埃及亚历山大城。

到范晔撰写《后汉书》时,除将"黎轩"写作"黎鞬"外,又出现了"大秦"和"海西"的名称。《后汉书·西域传》写道:"大秦国一名黎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史料:"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这里说的"幻人",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样的"善眩人"。这说明不断有埃及杂技艺人到中国来。

"大秦"一名,见于记载最早的是3世纪鱼豢撰著的《魏略》。《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黎轩。……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①《后汉书》沿用了这个名词。于是,代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除了称为"黎轩"、"犛靬"、"藜轩"或"黎鞬"外,有时又称为"大秦"或"海西"。

关于"大秦",究竟指什么地方,是中外学者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具体分歧意见如何,公认的看法是:大秦应指罗马帝国②。古代罗马帝国版图很大,其东部达到西亚和北非。埃及当时处于罗马帝国范围之内,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认为大秦系指埃及,或者说埃及是大秦的一部分,都是有理由的。不过,应该看到,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大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最初的"大秦",可以说是指整个罗马帝国,包括西亚北非一些地区。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

① 《魏略》一书久佚,见《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引。

② 冯承钧:《大秦考》,见《景教碑考》附录。

乃径还本国。”稍后成书的李延寿撰《南史·夷貊传》中也记有此事，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这条史料，反映三国时期中国与大秦有过交往。

房玄龄等撰《晋书·大秦国传》所记内容，有很多与《后汉书》所记内容相同。值得注意的一条史料是：“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晋书·武帝纪》也载有此事：“（太康五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由此可知，公元284年，大秦与西晋政府也有过交往。

魏收修撰的《魏书·西域传》中所记的大秦国，其内容也有一些同于《后汉书》所记，只是没有《后汉书》那样详细，李延寿撰《北史·西域传》大秦国条，全文录自《魏书》。

在我国古籍中，大秦还有一个名称，这就是“拂菻”。“拂菻”一名，有人认为始于隋唐，有人认为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有人认为始于西晋末年[①]。这里暂且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在魏徵撰《隋书·裴矩传》所引《西域图记》序文中，列举了从敦煌至西海的北、中、南三条通道。其中记载：“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这个拂菻，实指君士坦丁堡，以城名为国名[②]。唐代杜环在《经行记》中也记载：“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苫国指叙利亚。这时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缩至小亚细亚一带了。

刘昫编撰的《旧唐书·西戎传》和宋祁、欧阳修编撰的《新

---

① 参见陈连庆文《公元七世界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②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唐书·西域传》关于拂菻的记载,既有7世纪中叶以前的大秦(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的情况,也有7世纪中叶以后大秦的情况。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40年代,埃及已为阿拉伯人所占领。因此,7世纪中叶以后的大秦(东罗马帝国),就不包括埃及了。

阿拉伯人占领北非地区后,称埃及为Misr。因此,我国古籍中就出现了对埃及的另几种称呼。唐代著作中称“勿斯离”(《酉阳杂俎》),宋代著作中称“勿斯里”(《诸蕃志》),元代著作中称“密乞儿”、“密昔儿”(《西使记》)。其实,勿斯离、勿斯里、密乞儿、密昔儿都是Misr的音译,皆指埃及①。

脱脱修撰的《宋史》中没有记载埃及②。宋濂撰《元史》中关于埃及的记载也极为简略。《元史·顺帝本纪》称埃及为“米西儿”。《元史·郭宝玉传》中,简略地记述了郭宝玉之孙郭侃“从宗王旭烈兀西征……至密昔儿”的情况。

在张廷玉修撰的《明史》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埃及使节来中国访问的史实。《明史·西域传》写道:“米昔儿,一名密思儿。永乐中遣使朝贡。既宴赉,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又记载,正统六年(1441),埃及国王阿失剌福亲自率领使团来中国访问。明政府送给国王“彩币十表裹,纱、罗各三匹,白氁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对

① 马坚:《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第72、73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62页,三联书店1973年第2版。

② 《宋史·外国传》中虽有拂菻国条,但从所载内容看,有的史学家疑其并非古代的大秦。参见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是值得讨论的。

其一,《经行记》说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新唐书》则说摩邻国在“拂菻西南”,秧萨罗,据考证为耶路撒冷①。如前所述,拂森在7世纪以后已退至小亚细亚一带。而小亚细亚的西南方向,是地中海,摩邻国并不在海上。可见,《新唐书》上所说的拂菻,仍是指7世纪以前的东罗马帝国,其疆域包括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因此,《新唐书》所说摩邻国在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的地方,可以理解为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南,与《经行记》所说摩邻国在秧萨罗(耶路撒冷)西南,方位是一致的。这就是在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具体说来,就是摩洛哥或者范围更大一些的马格里布。

其二,《新唐书》在记载摩邻国的同时,又提到了一个“老勃萨”。从所记内容来看,老勃萨的方位、自然条件、物产、人们生活情况等等,均与摩邻国相同。那么,它们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呢?如果老勃萨是另一个国家,又在何处?

美国学者劳费尔认为,这个老勃萨,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访问过的剌撒②。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从《新唐书》所记内容来看,摩邻和老勃萨,即使不是同一个国家,也应该是相距很近的邻国。毫无疑义,它们都是在非洲。可是,即使是按劳费尔的说法,他主张摩邻国就是今天的肯尼亚的马林迪③;而剌撒又在哪里呢?迄今为止,剌撒的位置尚未确定。有人认为它是索马里的泽拉,

① 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②③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14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也有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马萨瓦的东南地方①。它可能是波斯湾西岸的哈萨，也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南端的沙尔韦恩角②。所有这些地方，都与马林迪相距甚远，而且有的根本不在非洲，其自然条件、物产和人们生活情况等方面，也同马林迪有很大差别。因此，说老勃萨就是刺撒，与《新唐书》所载内容不符，只是一种猜想。何况，摩邻国并不是马林迪，而应该是摩洛哥或马格里布。

我国学者对老勃萨的看法也不一致，张星烺先生认为，摩邻国是摩洛哥，老勃萨是指摩洛哥以东之地，即西经二度至东经五度的脱勒姆森（Tlemssen）；老勃萨是脱勒姆森的讹音③。沈福伟同志认为：摩邻和老勃萨是同一个国家；《新唐书》中写的"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是编纂者的失讹，应改为"有国曰磨邻，一曰老勃萨"。他认为，摩邻和老勃萨都是指的埃塞俄比亚古代的阿克苏姆王国④。

由于对摩邻国的所在有不同看法，因此也带来了对老勃萨位置的不同看法。从《新唐书》中所记的内容来看，认为老勃萨和摩邻是同一个国家，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笔者并不认为摩邻国就是阿克苏姆，因为说它是阿克苏姆，还有些尚未解决

---

① 参见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第46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陈祖甲《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动植物》，《人民日报》1965年7月2日。

② 参见向达《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见《郑和航海图》第25－26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第7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9－1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④ 沈福伟：《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

毛泽东毕生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他的思想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他一贯强调，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我们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毛泽东之所以钟情于二十四史等文史古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通过读史，透过历史的沧桑，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他阅读二十四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把握中国的今天，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读史很重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不但注意从政治、军事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而且也注意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干部作风、为人操守乃至养生之道等多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周振甫（中华书局编审）：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和《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样本）等书看，毛泽东批点的很可能只是二十四史中的十五史，他没有批《南齐书》、《梁书》、《宋书》，大概是因为批了《南史》的缘故，他没有批《魏书》、《北齐书》、《周书》，很可能是因为批了《北史》的缘故，他没有批《辽史》、《金史》，很可能是因为批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的缘故。他为什么没有批《元史》，原因还不清楚。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并不是每篇都有批语，而是只对某些重要篇章写了批语。如他读《史记》，只对《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两篇作了评论。我觉得《项羽本纪》比《高祖本纪》写得好，但是，毛泽东的评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却写在《高祖本纪》里。这是因为，第一，楚怀王与诸老将讨论是派遣项羽还是派遣刘邦"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的一段史实放在《高祖本纪》内，而《项羽本纪》不载。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楚汉之争中，项羽虽勇于战斗，非刘邦所能敌，但结果却是刘胜项败，毛泽东的评语正好写出刘胜项败的原因，即"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

长篇巨著陆续出版新的标点本。这是我国史学界的空前盛举，也是对世界史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业绩中，号召标点几部史书，并不占什么地位，但在60年代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提倡和支持，史学界人士恐怕是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工程的。因此，毛泽东虽然把毕生精力主要用在建国大业上，但他对中国史学建设的发踪指使之功也是不朽的。

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虽然都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像毛泽东那样一生酷爱读史、孜孜不倦地充实自己历史知识的政治家，恐怕还是罕见的。毫无疑问，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是与他对历史知识的价值、作用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他曾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把学习历史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中，恐怕是少有的。毛泽东读史与一般的历史研究者读史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这突出表现在他常常把历史和现实作某种联系和思考，既深化了对历史的理解，又能更准确、全面地把握现实问题。《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证。如毛泽东对《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是"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在读到《南史·韦奋传》时，毛泽东多处作了"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以少击众，将在前线"、"干部需和"、"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等批语。读了这些批注，我们不难想象，尽管古今悬隔，毛泽东的思绪经常要从遥远的过去落脚到现实生活中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毛泽东读史只对与现实有关或值得借鉴的历史记载有兴趣。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他的历史视野是极其广阔的。有时是在党的会议上

作报告,有时是在与同志们的谈话中,毛泽东经常轻松自如地引用许多历史典故,其历史知识之渊博,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也不能不折服。他和一些同志初次见面,往往可以从一个人的名字或籍贯引出一段有关的历史论述。如果没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他在谈论历史时是不可能这样运用自如的。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点评展示了一代伟人尊重历史和审视历史之辩证统一的恢宏气度。从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把二十四史作为经常阅读、评点的著作,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证明他对祖国悠久历史的真诚的尊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许多军事论著以及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撰写的若干论著,都充满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前途的观察,呈现了一代伟人的历史智慧。毛泽东对历史的重视是真诚的,同时他对历史的审视又是严肃的,这充分反映在他对待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态度上。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里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的分析,在这方面就极具典型意义。毛泽东读史,表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现实的历史运动走向胜利的三个条件,彰历代政治得失,察现实历史运动。他读二十四史,尤其关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为借鉴。诚然,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有类似的品质修养,只

作的评点批注的原貌，为研究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珍贵的资料，并可从中领略毛泽东手书真迹的丰采神韵。

（《光明日报》1997 年 12 月 26 日）

责任编辑：郭银星 王亦妮
封面设计：海马书装

史料整理丛书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

《史记》研究（上、下）
《汉书》研究
《后汉书》、《三国志》研究
《晋书》、『八书』、『二史』研究
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
《宋史》研究
《辽史》、《金史》、《元史》研究
《明史》研究

ISBN 978-7-5000-8010-7
定价：45.00元